

# 灰皮书，黄皮书

沈展云著

书籍介绍：

## 【本书简介】

“皮书”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物，记载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是很值得研究的，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皮书出版史”。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我国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政治、历史、哲学、文学著作，一律以灰色、黄色、蓝色、白色、绿色等单一色调作书衣，时人称为“灰皮书”、“黄皮书”等。“皮书”的出版，在世界出版史上堪称奇特的景观。文化大革命期间，精神粮食匮乏，“灰皮书”、“黄皮书”在很多知识青年中流传阅读，产生了很大影响。本书通过个案，对“皮书”出版作了大致的描述；由出版及于外国文化历史，引导读者从旁门走向世界。

-----章节内容开始-----

## 第一部分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

### 1.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1）

“皮书”的出版史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科学著作，是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所以“皮书”的出版是一项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重要政治任务。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大批判组”，名字五花八门，富有鲜明的时代政治特色，如什么“梁效”（指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石一歌”（即十一个人）、“罗思鼎”（寓意做“革命的螺丝钉”）、“丁学雷”（学习雷锋）或“某某工农兵写作组”、“七二一写作组”等等，这些写作组经常在《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各种“皮书”，有时候，人们就是从批判文章中透露的出版信息，去寻找“皮书”来阅读的。“皮书”虽然是“内部读物”，但除了小部分严格控制发行范围（如《新阶级》等），大多数都通过各种渠道在普通读者中传阅，特别是“苏修小说”一类的“皮书”，流传的范围更广，已没有什么“内部”可言。

“皮书”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物（据有关资料，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革”结束，大约出版了两千种外国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皮书”），记载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是很值得

研究的，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皮书出版史”。广西教育出版社在2000年12月出版了邹振环著的《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一书，其中第七章“潮起潮落——1949年至1966年的上海译坛”和第八章“荒芜年代的白皮书——‘文革’时期上海的翻译出版”，都写到上海出版“皮书”的历史情况，虽然比较简略，毕竟提供了一些线索和资料。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国翻译的苏联文学，公开出版的数量逐年减少，而内部出版的数量逐年递增：1961年公开出版22种，内部出版4种；1962年公开出版16种，内部出版4种；1963年公开出版10种，内部出版10种；1964年以后，所有“苏修”文学已成为“毒草”，均内部出版。1966年，只内部出版了卡扎凯维奇的小说《蓝笔记本》和《仇敌》，苏联文学的内部出版就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停止。到了70年代之后，又恢复内部出版“苏修”文学。

从1956年至196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一部分西方学术著作的内部出版任务，1958年9月，上海创办了由著名翻译家周煦良主持的内部刊物《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有论文、学派、人物、书译等栏目，一直到1966年4月才停刊。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71年恢复出版“内部书”，此后几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陆续以“白皮书”、“黄皮书”、“蓝皮书”、“灰皮书”等形式出版了一大批“苏修”文学以及一部分西方文学。当时，一些“靠边站”，在干校“接受改造”的翻译家、作家如草婴、丰一吟、李俟民、任溶溶、荣如德等和各出版社、报社、大学懂外文的人（各个语种都有）被集中起来，分成三五人一组，进行流水线式的翻译工作。干校成立巴巴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人世间》（绿皮书）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落角》（蓝皮书）了“翻译连”，全称是“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由草婴负责。接到译书任务后，将一本书拆开，然后几个人分别翻译其中的一部分。《人世间》、《你到底要干什么》、《落角》、《多雪的冬天》等二十多种“苏修”当代文学作品就是用这种方式翻译的。1972年下半年，翻译连的人员陆续从干校调回上海，继续作为“皮书翻译机器”，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署名翻译了一大批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和名人传记方面的著作。其他有关单位、大学的外语系和一些著名学者如周谷城、施蛰存等也参与了部分“皮书”的翻译。①这些“皮书”出版时一般都集体署名，如“某某翻译组”或用笔名，也有用个人的名字。

沙米亚金的长篇小说《多雪的冬天》（灰皮书）文化大革命前，中宣部指示出版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皮书”形式内部发行。20世纪90年代，此中译本重印，公开发行。北京方面的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则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陆续出版了大量“内部发行”的政治著作（主要是“灰皮书”），如托洛茨基的《被背

叛的革命》、《“不断革命”论》、《斯大林评传》，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路特·费舍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加罗蒂的《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比万的《代替恐惧》，拉斯基的《论当代革命》，以及论文集《苏联和未来》、《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考茨基、拉萨尔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的言论集，等等；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集》，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它》，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艾特玛托夫小说集》，《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克茹亚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加缪的《局外人》，萨特的《厌恶及其他》，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小说和戏剧，以及《托·史·艾略特论文选》，等等，以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需要。

## 第一部分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

### 2.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2）

人民出版社的老编辑张惠卿是当年直接参与“灰皮书”出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据他回忆，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论战前的理论准备，为了使党的高层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的形式出版一批“修正主义者”和西方理论家的政治著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灰皮书”。因为“灰皮书”是供批判用的，故“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的对象都严格控制”。有些属于“灰皮书”内容的书也采用过红色、黄色或白色封皮。在阶级斗争激烈紧张的岁月，连颜色也有阶级性，“如人民出版社的‘《红旗》丛刊’，白色封面，书名用红、绿两种颜色来区别其内容是‘正’还是‘反’”。红色当然是正的、革命的，灰色或黑色等灰暗的色调则表示是“反动”的。张惠卿说：“出版‘灰皮书’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和部署，陆定一部长指定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和副处长许力以具体负责，并在中宣部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总司其职，任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为该室主任。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组织编译出版事宜，由我任组长。

中央编译局根据资料，编印出一份《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收入了近四十名所谓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包括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伯恩斯坦、考茨基、福尔马尔、阿德勒、鲍威尔、希法亭、饶勒斯、米勒兰、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托

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书目列出以后，除了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找原著外，还派人到国外去寻找购买。

第一本‘灰皮书’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的《伯恩斯坦、考茨基著作选录》。……‘灰皮书’从1961年开始出版，1963年和1964年是高峰期，出版数量最多，因为中苏大论战就是在此时展开的；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断。‘灰皮书’从1972年起又继续出版，到1980年，先后出版了二百多种。其中有德国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等五六种，考茨基的名著《无产阶级专政》及《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等近十种，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多种，奥地利鲍威尔的《到社会主义之路》，德国列斐费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意大利陶里亚蒂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比利时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南斯拉夫弗兰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波兰沙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若干问题》，法国米勒兰的《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加罗蒂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等及一批有关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著述。

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家出版局的统一安排下，国内多家出版社又陆续选译出版了一批内容和‘灰皮书’类同，但范围有所扩大的现代外国政治著作（即《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到1984年终止，出版了约一百种。这批书可以说是‘灰皮书’的延伸，同样具有特殊意义。

1980年前后，人民出版社还以‘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出版了多种与中共党史有关的参考书，其中包括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明的《中共五十年》、陈公博的《苦笑录》及著名托派人物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和《郑超麟回忆录》等，印数很少（每种只印五百册），内部控制发行（近年人民出版社以其副牌东方出版社的名义、用‘黑皮书’的形式重新出版这批书，也是内部发行——引者）。“张惠卿还披露了两件与中国‘托派’有关、也与‘灰皮书’的出版有关的轶事：“当时托洛茨基的著作最难获得，因为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把他的全部著作清除干净了。1963年，我奉中宣部之命专程到上海找公安部门联系，因为1952年12月我国曾有一次全国性的‘肃托’行动，把在国内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全部逮捕。上海人数最多，也最集中，他们家中保存的托洛茨基著作都被收缴了。

几经周折，终于在公安局的一间仓库的角落里找到了这批书，已积满了灰尘，大多数是1949年之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有《十月的教训》、《俄国革命史》、《“不断革命

“论”、《中国革命问题》、《被出卖的革命》等二十多种。……中共‘一大’代表、曾在 1929 年到土耳其去拜访过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的刘仁静，当时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当他得知我们正准备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而苦于找不到原著时，就将他保存了三十多年、托洛茨基本人赠送给他的《托洛茨基文集》原版献出来，这些十分珍贵的书后来都被用上了。……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论述很多，‘灰皮书’中则只字未收。”（见张惠卿《“灰皮书”的由来和发展》，《出版史料》2007 年第 1 期）

## 第一部分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

### 3.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3）

1962 年至 1965 年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的部分苏联文学“黄皮书”关于文学类“皮书”的出版背景，张福生的访谈体文章《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有较详细的表述。据张福生所说：文学类“黄皮书”的出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主要在 1962 年至 1965 年间，为配合“反修批修”的政治大背景，集中出版了小说《苦果》、诗歌《人》、剧本《德聂伯河上》、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等一批“苏修文学”。第二阶段是“文革”中期到“文革”结束，主要在 1971 年至 1978 年间，又出版了一批，如《人世间》、《白轮船》、《滨河街公寓》等，但封面已由“黄皮”特里丰诺夫的小说《滨河街公寓》（白皮书）

改为“白皮”或“灰皮”。“黄皮书”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时还用了“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在“文革”前，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就像三联书店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一样。根据张福生的叙述，作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文学“黄皮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从这批书的出版年代和书目不难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诞生的。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出版界的前辈、‘黄皮书’最初的负责人孙绳武和秦顺新等先生。他们说，1959 年至 1960 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斗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反修工作服务是责无旁贷的。根据当时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爱伦堡文艺思想等，出版社确定了一批选题，列选的都是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这个问题，我也曾在 1998 年 10 月问过《世界文学》的老领导陈冰夷先生，他说的大致意思是：1959 年 12 月到 1960 年 1 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一次跨年度的文化工作会议，透露出来的是比中宣部领导周扬更高一层人物的精神。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这是很明确的，但没有正式文件……陈冰夷

还提到一个背景：1959年5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率领代表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对许多问题争论不休，而我们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张福生又引述了另一位知情人李曙光的话：“1959年12月那次新侨饭店会议后，周扬找了一些专家、理论家座谈，探讨反修、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主要是要大家对外国文学界发生的大事加强调研，要出反面教材，为领导提供参考。陈冰夷、姜椿芳、冯至都参加了座谈。中宣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反修小组，经周扬和林默涵研究，具体负责人是林默涵。这个小组主要是起草反修文章，同时抓‘黄皮书’的出版。”据张福生统计，“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文学类“黄皮书”，小说约二十种，诗歌三种，剧本十余种，文艺理论约十多种。除了苏联文学作品，还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瑞士等国家的小说和文艺理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黄皮书”的出版也中断了。再重新出版，已是“文革”中后期的1971年至1978年左右。这个时期内部出版发行的“苏修”文学和其他外国文学，约有数十种，封皮则有黄、白、灰、绿等各种颜色。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也参与出版文学类“皮书”。译者中，有不少是翻译界的名家，如草婴、孙绳武、苏杭、冯江南、荣如德、王士燮、蓝英年、程代熙、施咸荣、王金陵等等。有一些是用笔名，其实是几个人合作翻译。②“文革”后，很多“黄皮书”已公开出版，“内部发行”逐渐成为历史。

作为“黄皮书”出版工作的当事人、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孙绳武先生也写了《关于“内部书”：杂忆与随感》一文。他的回忆也提供了一些具体的细节：“1960年，作家协会的领导召开了两三次外国文学情况交流会。出席的人员不多，由当时作协领导层负责外事工作的严文井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罗大冈、杨宪益、曹靖华等先生，以及世界文学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少数人。会议初期的中心议题是西方文学的新现象，因为当时文学界对苏联、东欧了解较多，而同西方接触极少。这几次会议上谈到了英、法、美的一些作品及倾向，例如反映这些国家中的青年人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即所谓‘愤怒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品，并决定选几种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其中有《往上爬》、《愤怒的回顾》、《在路上》，后来还加上了《星期天晚上和星期日白天》。这些就是不公开发行、也不作宣传的所谓‘内部书’出版的开始。过了不久，‘内部书’开始以翻译反映苏联文学中的一些新的倾向的作品为目标。最先出版的一本是美国人编选的暴露苏联社会生活中阴暗面的《苦果》。爱伦堡的小说《解冻》（黄皮书）苏联小说集《苦果》（黄皮书）以后接连出版的几部都是在苏共二十大后突出反对个人迷信或主张自由化的作品，首先是爱伦堡的小说《解冻》。爱伦堡可谓是自由化的一面旗帜，为了了解和研究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不久又翻译出版了他的长篇回忆

## 第一部分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

### 4.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4）

在1960年至1970年间，日本文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复活军国主义的热潮，拍了宣扬胜利和悲剧的影片《山本五十六》和偷袭珍珠港的《虎、虎、虎》。接着，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自卫队的集会上为军国主义招魂，并当众剖腹自杀。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负责人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尽快将三岛由纪夫的主要作品译出。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了三岛的《忧国》、《丰饶的海》等四部小说……‘内部书’前期主要供应给文艺界和领导，严格地按一定范围发行；20世纪70年代后，这类出版物逐渐转向更多方面的读者，略有扩大印数，改为‘控制发行’。粗略估计，单是苏联小说就出版了大约八十种。”③

有论者谓，1976年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是有其思想渊源的。“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发生在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中的地下读书活动。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关于红卫兵和知青生活的回忆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一代人的阅读史是惊人的相似。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后，除了毛泽东的著作和一些‘钦定’的书籍外，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都被禁绝了。但在红卫兵的革命疯狂逐渐冷却下来后，他们开始感觉到精神的空虚和知识的贫乏，便如饥似渴地找书来读。这些书籍包括60年代和70年代为了‘反修防修’斗争需要而出版的‘内部读物’（俗称‘灰皮书’、‘黄皮书’等，供高干持特殊证件去内部书店购买，但实际上已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民间——引者）、被禁的西方名著、苏联的‘解冻’文学作品、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著作以及1957年的右派言论等。当时他们只能偷偷地阅读这些‘禁书’，在亲密朋友的小圈子内互相交换图书，也互相交换心得，形成一个广泛的‘地下读书活动’。在亲身经历了‘文革’的残酷和虚伪后，这些书籍成为他们思想启蒙的营养和精神食粮。‘文革’中的地下读书活动一直可以追溯到60年代初。当时已经有一些青年学生不满学校的正统教育，秘密地组织起来阅读为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的书籍，从事独立的文学创作，甚至批评当时的政治现实。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北京的两个团体：‘X诗社’和‘太阳纵队’。‘X诗社’是以北京师范学院学生张鹤慈（张东荪的孙子）为核心的，主要成员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等。据张鹤慈回忆：‘高中时开始看大量的西方古典和近现代作品，在家里和一些大学图书馆还能找到一些内部读物。我和郭世英用了郭沫若的内部购书证去买过许多内部书籍，尤其是新出的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书。’……最后，

这个一群年轻人求索真理的读书会被定为‘反革命集团’。1963年5月，其成员全部被捕，张鹤慈在监狱中整整度过了16年，郭世英被送到农场劳动……先后活跃于京城秘密读书组织还有‘赵一凡沙龙’、‘徐浩渊沙龙’等，徐浩渊因为写了《满江红》一词影射江青而入狱两年。这些觉醒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读书讨论，他们阅读了许多‘灰皮书’和‘黄皮书’，尤其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根本改变了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其中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对他们影响最大。他们讨论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未来的命运。这些‘地下读书沙龙’最终都被镇压了。徐浩渊后来回忆：‘流传于各个小圈子内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油印本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等等都惊世骇俗般地打开了我们的迷蒙的眼界。’”（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关于地下文学团体“X诗社”的含义，按郭世英和该社其他成员的解释，“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含义广泛。“X诗社”的成员被捕后，“太阳纵队”也不敢再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只能化整为零地在个人之间交流阅读“皮书”的心得。当时的郭世英，因其特殊的家庭背景，阅读了大量内部发行的西方政治、历史和文学著作，据说他经常与地下沙龙的文学青年接触，互相交流作品和对时政的看法。郭世英对俄苏文学很熟悉，常常热情地向其他青年同学介绍这方面的读物。他对“特权阶层”有深刻的看法，他在与一些高干子弟讨论这个问题时曾说：“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很多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他们因为反抗专制统治，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受鞭笞，做苦役；他们抛弃了优裕的生活是为了什么？我们应当读一读安德烈耶夫的《消失在暗淡的夜雾中》，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④郭世英这个“觉醒者”，在“文革”中惨烈地死于非命。据“太阳纵队”的张郎郎回忆：他父亲有内部购书证，购买了很多“灰皮书”、“黄皮书”，他把其中的一些“黄皮书”拿到学校，向同学推荐，大家一起朗读其中的片断。“在‘黄皮书’中，我们喜欢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但最喜欢最受震撼的还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当时狂热到这种程度，有人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全书抄下，有人可以一大段一大段地背诵《在路上》。那时觉得，书中主人公的精神境界和我们很相近。”⑤

## 第一部分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

### 5.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5）

《沉沦的圣殿》一书记录了“文革”期间文学青年阅读“皮书”的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精

神食粮匮乏，“黄皮书”在很多爱好文学的青年中流传阅读，产生了很大影响。“文革”结束后，他们在文章中回忆起当年的读书生活，常常提及“黄皮书”、“灰皮书”等内部读物。萧萧在《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一文中回忆：“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烧掉所有图书，由于抄家、红卫兵掌管了部分图书室等种种原因，不少‘文革’前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读物’也流落到他们的子女及一般青年学生手里。他们面对破碎的世界，在这些书中寻找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这种人生启蒙期中的精神漫游，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代历经磨难者们难得的自由时光。”

这是在这一读物体系中熏陶出来的一代……‘文革’中的读书运动一开始便呈现出异质化的特点，他们千方百计地偷尝‘禁果’，在‘内部书’中汲取精神营养。对‘文革’青年的思想转变起到重大作用的‘灰皮书’、‘黄皮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登场，并在一代人的思想历程中催化了精神核裂变的。

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皮书’便成了一代人与世界‘沟通’的惟一有限的思想资源。因而，这一代人的精神阅读史惊人地相似。富于历史讽刺性的是，这些原应当由‘革命的一代’去批判、去铲除的‘封资修’的毒草，却成了孕育、萌发他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的养素……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什么这些觉醒中的红卫兵们对‘灰皮书’、‘黄皮书’情有独钟？其实，只要看看这些‘皮书’的作者和内容，便不难回答这一并不复杂但又意味深长的问题。一些‘皮书’对斯大林时代阴暗的权力斗争、对斯大林主义和大清洗内幕的揭露，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对‘解冻’的盼望，触发了‘文革’中觉悟的青年一代的强烈共鸣。这一代人在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中深切地体会到这场披着革命外衣的运动的虚伪性，亦广泛地目击和承受了其黑暗性和残酷性。”⑥葛岩在《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一文中说：“从60年代末期开始，不少曾积极参与‘文革’的大中学生失意于现实，其中的一些人开始阅读禁书，形成今人所说的地下读书活动。这种时为禁忌的活动分布广泛，参与者众多，在某种程度上，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在民间的序幕，是催生日后许多理想主义文化精英的摇篮。《今天》杂志的诗人中，‘星星画派’的艺术家，中，《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中和参与改革设计的策士中，不少人是在地下读书活动时开始了其知识和文化的准备……”

从1968年上山下乡开始至1977年恢复高考，地下读书活动延续十年之久。其间，‘老三届’中学毕业生，‘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加上六九到七七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约有1623万之众。可以猜想，精英之外，必有许多普通的青少年也曾阅读过禁书……即使在严峻的控制下，异端知识依然可能获得传播……在‘文革’期间，不少城市都有‘内部书店’，这些‘内

部书’中，一类是’文革’前出版的所谓’灰皮书’、’黄皮书’，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据说，最初是毛泽东为了给干部们作’反面教材’而翻译的。第二类是文化大革命中翻译的外文书籍，如《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等，还有许多当代的文学作品，如苏联的《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人世间》、《绝对辨音力》、《艾特玛托夫短篇小说选》等，美国的《爱情的故事》、《乐观者的女儿》等。有三本书印象深刻，一本是考茨基的，好像叫《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它让我知道那位在中国臭名昭著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许多见解；第二本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另一本是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它让我领悟到某种超越阶级和时代的善，一种无力但不屈服的善……

## 第一部分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

### 6.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6）

当时也读过《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的《开罗文件》，其中一章谈切·格瓦拉，特别描述了切在古巴建立起社会主义后的困惑，对新制度必然滋生特权阶层的无奈……还借到上海出版的《摘译》丛刊（哲学社会科学版），了解到法国左派共产党人贝特兰和美国共产党主席保罗·斯威齐正在公开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各地地下读书群阅读到的主要书籍几乎一样，西方古典文学名著、苏联文学和有关共产主义思想流派的著作，思想政治领域的书籍则多局限于不同共产主义流派的争论……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思想的反叛由被反叛了的思想来规定。”（《万象》2007 年第三期）一个作家回忆她当年阅读《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等“皮书”，“如此明晰地看到现实政治舞台上的那种明争暗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阴暗面。斯大林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简直像孪生兄弟一样”。一位原北大的读书小组的成员回忆：“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黄皮书’，记得当时最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经历了一个全面的压迫和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们冲破十几年的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则得益于一些’灰皮书’。这些书仿佛是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之光，至此，对政治和社会的认识，使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魇般的桎梏和愚昧。”⑦徐晓（著名民间刊物《今天》的成员）回忆她和赵一凡（《今天》的创始人之一）等人在“文革”中的读书岁月：“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铁托传》、《新阶级》都是那时读的。虽然其中有许多我不能理解，我以为理解了也未必都真的理解了，但我都读得兴味十足。”⑧诗人芒克和画家彭刚也谈到，《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

者》等“黄皮书”在“文革”期间对他们产生了影响。诗人林莽回忆：当年他当知青到了白洋淀，1973年，江河（诗人）带来的一本“黄皮书”就是《带星星的火车票》，“这是我接触的第一本‘黄皮书’，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书中写的是俄罗斯的一代中学生，他们对苏联社会生活的一种感受。他们想离家出走，寻找金羊毛。当时我们觉得苏联那一代人，阿克萧诺夫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黄皮书）艾特玛托夫的小说《白轮船》（白皮书）对社会的反抗意识和觉醒，确实和我们有相似的地方。”<sup>⑨</sup>诗人多多在文章中写道：“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sup>⑩</sup>诗人、小说家马佳也回忆：“当年受‘黄皮书’的影响，什么《麦田里的守望者》、《〈厌恶〉及其他》、《白轮船》、《带星星的火车票》，还有一批手抄本，我至今仍非常坚定地认为，‘文革’后的中国诗歌和文学受这些书的影响之大是不可估量的。”诗人宋海泉说他和一些诗友就是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一书中知道俄罗斯伟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名字，“当时，《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带星星的火车票》等‘黄皮书’也在知青中流行，很多知青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流浪的经历，受到它们的影响”。陈丹燕《苏修短篇小说集》（绿皮书）

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一书中记录了上海一些已经步入中年的文化人有关“皮书”的回忆。学者李天纲说：“‘皮书’中印象最深的是《多雪的冬天》和《人世间》，那里面的惆怅给了我很大的震动。”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周克希说，他记忆最深的“皮书”是《落角》。作家刘绪源对《苏修短篇小说集》印象很深：“我读后非常震动，当时觉得这些作品对人物内心复杂性的描写，在中国小说里似乎没有达到这样的精确和有力。”一位读者回忆当年读“皮书”的感受：在荒芜的年代里，这些书“无异于荒漠之泉，那是一种近乎如醉如痴物我两忘的阅读。读过的有欧美的政治著作，外国政要的回忆录，西方现代派文学……于我来说，最亲切最动人的还是苏联当代作家的那些中长篇小说。俄苏作品曾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桃花源，曾成为我青春的梦乡”。

作家王尧撰写专文谈“皮书”：“就在我和我的少年伙伴读‘红色经典’的时候，城里的青年却在读‘黄皮书’、‘灰皮书’这类‘内部读物’。研究当代思想史的学者差不多都认为，‘文革’后期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1980年代点燃新启蒙思想运动的火种，其中一部分火星源自那批‘内部读物’。……根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有40本左右的‘内部读物’对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产生过重大影响。关于‘皮书’在文化专制时期对思想文化界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少研究者的文章都有深入的分析。近读张光年的《向阳日记》，发现他也读

过‘皮书’，1975年11月20日日记：‘大周明送来代购的《人世间》、《落角》等内部发行的翻译小说五册。’”

## 第一部分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

### 7.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7）

特罗耶波尔斯基的小说《白比姆黑耳朵》（白皮书）学者朱学勤也回忆，“文革”期间，他为了觅得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千方百计弄到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在上海福州路内部书店购买了此书，还冒了一些风险。很多内部出版物如《摘译》等书刊，“是我们当时的启蒙读物，也是多年后萦绕于胸的一个历史之谜：在‘文革’时期的上海，何以会出版这么一大批灰色‘反动’书籍？很多年后结识了当时主持此事的一位老人，方才得到解释。我问那时是否有心而为？他的回答很朴素：‘我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放大范围去做，只是为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着想。他们在乡下，没有书读啊！北京方面来人责问，我拿出毛的批示，顶了回去。’”（《我最喜欢的几本书》，见2007年2月1日《南方周末》）

在内部发行的苏联和西方文学“黄皮书”中，当年对青年一代影响最大的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其他如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和《解冻》、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最后一个夏天》、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邦达列夫的《热的雪》和《岸》等等，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如萨特的《厌恶》、加缪的《局外人》等，也对“文革”中觉醒的一代青年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 注释

①见《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第291、326-330页；邹振环著，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②《中华读书报》2006年8月23日。

③《中华读书报》2006年9月6日。

④《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第24页；廖亦武主编，新

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9 年 4 月出版。

⑤同上书，第 38 页。

⑥见萧萧：《书的轨道：一部精神阅读史》，载《沉沦的圣殿》第 4-16 页。

⑦转引自上文。

⑧《沉沦的圣殿》，第 159 页。

⑨同上书，第 291-292 页。

⑩同上书，第 195 页。

同上书，第 219 页。

同上书，第 254、258 页。

转引自《20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第 343-345 页。

王尧：《翻译的“政治”》，《南方周末》2006 年 11 月 16 日。

## 第二部分 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斗争

### 1. 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斗争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灰皮书）《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苏]达·里·戈林科夫著，赵永穆等译；群众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出版。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一时期：1917-1923）》[法]夏尔·贝特兰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8 月出版，内部发行，“灰皮书”。

1917 年的十月革命虽然摧毁了旧的社会体制，但苏维埃政权还未完全稳固，旧有的政治力量也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布尔什维克为了巩固新政权，与各种残余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同时，也在党内开展了广泛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从 1917 年至 1929 年，所谓“肃反”（肃清反革命），就成为新政权的政治主题。要了解这一时期苏联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有两本书不可忽视，一本是《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

灭》；一本是《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前一书的作者戈林科夫是苏联法学家，早年长期从事肃反工作，先后在苏共中央和地方检察机关担任过特大案件的侦察员。他以苏俄肃反机关、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的大量侦查和审判材料为依据，详细介绍了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至1929年之前苏维埃政权-苏联政府的肃反斗争，叙述了反对苏维埃的地下组织、国外反对势力、政治帮派、武装叛乱集团、社会党组织、宗教团体、经济组织等的兴起和覆灭，以及谋害列宁和暗杀俄共（布）其他领导人等重大案件的经过，是站在苏联官方立场上研究这一时期苏俄肃反斗争的一部详尽的专著。后一本书的作者贝特兰，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已经研究苏联问题，并多次访问苏联进行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资料。此书（第一卷）的论述重点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到列宁逝世前（1917-1923年这段时间）的阶级斗争以及俄共（布）在党内进行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及其产生的后果，指出专政机关的“专横”和“镇压过分”（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造成苏维埃政府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障碍”。《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中译本只是原书的第一卷“第一时期：1917-1923”，以后几卷拟分别写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据译者介绍，当时（1974年）尚在撰写中，拟陆续出版，究竟作者有没有写完以后的部分，笔者孤陋寡闻，不得而知。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中译本分上、下册，厚达七百多页、五十多万字。主要章节有：对反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初期镇压；苏维埃肃反机构的建立；同反对派新闻报刊的斗争；1918年春夏苏俄的社会-政治局势以及肃反斗争；列宁对肃反机构的监督；1919年对国内外反苏维埃活动的决定性胜利；白卫分子武装力量被彻底剿灭；从战争转向和平；著名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事件；肃反委员会对反对派的最后打击；新经济政策对肃反斗争的影响；国家转向社会主义时期反对派组织的复活和覆灭等等，内容相当丰富。《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中译本采用当时内部书较常见的大字排印（三号字，以适应领导阅读），也有七百多页，约35万字。主要章节和内容有：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1917年至1921年期间苏维埃政权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战时共产主义”；取消各党派及资产阶级报刊的过程；“契卡”（肃反机构）的成立和发展；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列宁逝世前的苏俄形势等。以下据此二书及相关资料，综述1917-1923年苏俄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

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农奴制度，沙皇是拥有无限权力的专制君主。在专制制度下，地主贵族享有最大的特权，农奴制对农民的压迫异常残酷；而东正教教会又与沙皇政权联盟，更是助长了沙皇的专制统治。沙皇的专制统治引起了俄罗斯人民的强烈反抗。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民粹主义的思想领袖和革命民主主义

者，“十二月党人”等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就是那个时期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优秀知识分子。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又变成垄断资本主义。1914年，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的政治危机，很多地方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1917年，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领导、民众广泛参与的二月革命（此处所指系俄历），推翻了沙皇，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覆亡，尼古拉二世被关押在皇村。之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权力二元化”局面：一个是以孟什维克居主导地位的苏维埃政权（当时布尔什维克尚处于隐蔽活动），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苏维埃是以工人、士兵为代表的人民政权，而临时政府旨在建立议会宪政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这是俄国历史上空前自由和政治多元化的时期。3月，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逮捕沙皇，得到临时政府的批准和授权。临时政府将沙皇交给苏维埃政权处置，注定了沙皇一家后来遭遇的悲惨命运。同年4月16日，流亡国外多年的列宁，如凯旋者一般乘火车经德国、芬兰回到彼得格勒，跟随他返国的有几十个流亡国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工人、陆海军士兵为列宁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他满怀信心走出车站，登上一辆装甲车，向广场上的士兵和群众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讲，号召他们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而斗争。1917年的列宁，“他不用担心宗教法庭的威胁，他也不能确定控制社会是否像控制机器那么单纯；但他克伦斯基（1881-1970），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和律师。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克伦斯基既是临时政府的成员，又是苏维埃代表。而十月革命推翻了克伦斯基任总理的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克伦斯基流亡法国，后移居美国。1970年在美国逝世。一路勇往直前走向彼得格勒，他知道他成功的几率远远超过百分之一，他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的前夕，他手上握着开启人类另一历史新页的钥匙。现在，列宁要开启的这扇大门，所展现的前景如果与他所期待的样子不符合，他随时准备要改弦易辙，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最不相信先知判断的人。”（艾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及发展》，台湾麦田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4月17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代会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著名的《四月纲领》，这份宣言强调，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临时政府，不赞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议会制度，主张“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号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5月，托洛茨基等人也相继回到俄国。布尔什维克恢复公开活动，向早已厌倦战争的俄国人民进行鼓动宣传。7月，列宁领导的旨在推翻临时政府的起义失败，布尔什维克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托洛茨基等领导人被捕，列宁又逃亡到芬兰（后在10月20日再次秘密返回俄国）。8月，布尔什维克成功扭转局势，新的起义一触即发。此时，著名作家高尔基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强烈谴责暴力革命性质的起义，高尔基的

观点得到很多民主知识分子的赞同。但形势急速发展，俄国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推翻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随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十月革命在当时曾引起布尔什维克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如卡尔·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曾做过恩格斯的私人秘书，也是马克思著作的编辑）认为，在俄国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其理由是缺乏强大的、充分发展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以及高度发展的工业基础。为此，考茨基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著作。列宁对考茨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 第二部分 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斗争

### 2. 十月革命后的政治动荡和反苏维埃…

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发生了一件载入史册的重大事情。苏维埃政权刚建立，列宁就考虑如何使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之一的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为此向各交战国提出举行和平谈判。英、法、美、意等协约国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而俄国的敌对国德国为摆脱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严重困境，却愿意与苏维埃政府单独谈判，缔结和约。但德国政府开出要俄国割地赔款的苛刻条件：苏俄承认乌克兰独立；把白俄罗斯以及一部分高加索地区割让给德国；放弃对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管辖以及领土主张；支付60亿马克的战争赔偿等。1918年2月，德国进攻苏俄，逼迫根基未稳的苏维埃政权签订城下之盟。鉴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困难重重，内忧外患，无力应战；更为了争取喘息机会，以腾出手来消灭国内的反对派，列宁决定接受屈辱的和约条件。列宁的决定在国内引起巨大震荡，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合法反对派”指责布尔什维克出卖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分成两派，大部分人（包括布哈林、托洛茨基）持反对态度，只有斯大林等少数人支持列宁。兹事体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在2月23日就是否接受德方的条件进行表决。列宁一直坚持退让，而且态度强硬，他认为勉力应战，将会葬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声言，如果不接受德国的条件，十月革命期间的列宁他就辞职，退出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最后的表决结果是：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决定接受德国的最后通牒。2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表结对德和约，结果是116票赞成，85票反对，26票弃权，同意接受德方提出的全部条件。1918年3月3日，苏俄与德奥等同盟国在邻近波兰边境的白俄罗斯西南部城市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称布列斯特）正式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宣布双方战争状态终止。德俄和约的签订虽然间接地使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并为其后来击退国内反对力量和外国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却以苏俄丧失了大片领土和势力范围为代价。在“围绕着布列斯特和约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的

关系进一步恶化”，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同盟破裂。“列宁为保住苏维埃政权而吞下了布列斯特和约这颗苦果”。1918年11月10日，德国爆发革命，13日，协约国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翌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sup>①</sup>

从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到20年代初，苏维埃政府立即着手实行全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造。但此时的苏俄又陷入内战的泥淖之中，经济全面瘫痪，生产力水平倒退了几十年，人民的生活极其困难，发生了全国性的饥荒。在城市，食物严重短缺，暴乱频仍，犯罪率升高；市民吃的面包都混合了稻草和其他“替代品”，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之中的人民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挣扎。布尔什维克在危急之下，采取错误的非常手段，无偿地强行征集农民本已微薄的粮食，引起农民的强烈反抗。肃反扩大化又导致滥捕滥杀，遍及旧职人员和知识分子阶层。更令人震惊的是，苏维埃政权在1918年7月18日（一说16日）下令处死已被囚禁的沙皇全家，其中包括年幼的孩子和医生、仆人等十多人，这对红色政权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在苏维埃新政权建立的最初阶段，遭到了各种反对派势力和民族主义者的顽强抵抗。当时，强硬的反苏维埃阵营的主要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妻子亚力山德拉以及子女们。1918年7月18日，沙皇全家在囚禁中被处决，骸骨在苏联解体后才被发现。

力量有地主、一部分大工业家和大商人中的保皇分子（他们和君主制休戚与共，愿意为反对苏维埃的活动提供援助和支持）、希望恢复沙皇制度的高级官吏、教会和旧军队的高级将领，以及由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的立宪民主党等。立宪民主党人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最佳方案。他们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主张社会渐进发展。但是他们也承认在某种情况下可能甚至必然发生政治革命。……他们认为：政治革命是政府‘不理智’政策和不能及时进行政治改革的结果。……立宪民主党要求有言论、集会和罢工自由”。<sup>②</sup>此外，右派社会党人、小资产阶级、“民粹派”、孟什维克分子也纷纷表明政治立场，他们的共同愿望是通过与资产阶级达成妥协，在俄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他们打出保卫临时政府、保卫立宪会议、保卫“纯粹民主”的旗号，加入了反苏维埃的阵营。立宪民主党人号召广泛的消极怠工，支持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武装行动；而反苏维埃的武装核心则由原沙俄军队中为数众多的军官组成。

## 第二部分 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斗争

### 3. 十月革命后的政治动荡和反苏维埃…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以较大的篇幅叙述了政治反对派和武装反对派被消灭的过程。在十月革命以前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中，俄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推翻沙皇统治后，布尔什维克又号召推翻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孟什维克是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分裂出来的“少数派”，十月革命爆发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立即退出苏维埃代表大会，支持并参加临时政府（但孟什维克一直到1918年7月之前仍参加苏维埃的活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一样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拒不承认在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因此，他们赞成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社会革命党人是支持这种政治倾向的最重要的势力”，③在各个“民主党派”中，社会革命党是最早公开对苏维埃政权持异见的反对派。社会革命党是当时俄国人数最多、最有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二月革命后，该党成为俄国最大的政治力量，党员达一百万。④在十月革命时期，社会革命党的社会基础是农村和城镇中的教师、公职人员等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在1917年的革命过程中分裂为左派和右派：左派在中农中间有很大的影响，1917年至1918年之间曾一度与布尔什维克短暂合作过（1918年7月与苏维埃政权决裂）；右派则逐步靠近立宪民主党，并从1917年10月起对苏维埃政权采取军事行动，在内战时期还参加了好几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曾经与布尔什维克党若即若离的无政府主义者（深受巴枯宁思想的影响，主张废除国家来实现社会革命）由于参与了社会革命党的抵抗活动，也成为反对派。

十月革命之后，社会动荡，党派林立，政见纷争，形成拒绝承认和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两大派系，斗争的焦点则在是否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大多数党派反抗沙皇专制统治提出的政治主张，它要求进行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建立民主宪政。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是支持立宪会议的，认为“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列宁语），并将立宪会议的口号写进党的许多决议和传单中。如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明确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坚信，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巩固地实行……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⑤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反对召开立宪会议，列宁曾宣布“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都拥护立宪会议，希望由立宪会议解决国家政权问题。孟什维克认为苏维埃不过是一间“临时的简易木房”，立宪会议才是一座“坚固的大厦”。⑥由于立宪会议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民意。立宪会议原定在1917年12月11日（俄历11月28日）召开，“保卫立宪会议同盟”散发了大量传单，号召工人在立宪会议开幕之日罢工，走上街头，在“一切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下举行示威游行。有数千人参加了在彼得格勒的示威游行，其中有旧军人、大中学生、官吏、小商贩以及社会革命党人、

人民社会党、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等；同时，反对势力的武装力量也在准备夺取政权。苏维埃军事力量平息了这次反对活动。苏维埃政府认为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是国内所有反对势力的大本营，当晚，人民委员会通过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与人民为敌”，系“反动组织”，并逮捕了立宪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送交革命法庭审判。1918年1月5日（俄历），苏维埃政府召开立宪会议，但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为少数派，遂宣布退出立宪会议，并在当天立即开会，决定解散立宪会议。自此，苏维埃政权意识到党派林立对布尔什维克造成威胁，于是严格限制，后来就实际上禁止（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一切政党存在。到了1918年夏天，所有的孟什维克党人因为进行反对活动而被开除出苏维埃组织，主要骨干被捕。但在1919年12月，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邀请了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参加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孟什维克的两位领导人发言，赞成“革命统一战线”，要求“恢复宪法的作用……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列宁后来在回忆中认为这些要求实际上是“退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去”，他说：“当我们听到声言同情我们的人发表这种宣言时，我们就说：不，恐怖手段和肃反委员会都是绝对十月革命时期的托洛茨基必要的。”<sup>⑦</sup>

## 第二部分 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斗争

### 4. 十月革命后的政治动荡和反苏维埃…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各地的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就进行顽强的抵抗。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力量很薄弱，没有一支统一的军队，只能依靠零散的赤卫队和游击队，仅仅控制了俄罗斯中部地区。英、法、美、意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都不承认苏维埃政府，而且进行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除了要对付外敌，还陷入了与各种反苏维埃势力较量的国内战争。为此，苏维埃政权决定创建一支隶属于党、而不是隶属于国家，以崭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为特征的军队，换言之，军队要“党化”而不能“国家化”。1918年2月，第一支以工人为主体的红军部队组成，并立即开赴前线，抵挡德军的进攻。3月，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军事人民委员，负责组建正规红军。初建的苏俄红军可以说是杂军，除了大量战俘，还使用了相当数量的经过“改造”的沙俄时代的军官，有一段时间，红军征用了四万多名旧军官。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苏维埃军队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旧军事机器”的继续。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军队不是十分放心，特别警惕地注意着军队内部的一切，以防发生变故。但紧迫的形势又不容苏维埃政权有太多的顾虑，所以，红军刚刚建制，就立即投入战斗，首先是镇压由五万名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允许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回国，这些战俘在回国途中组成捷克军团，发动叛乱，很快就占领了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中游的重要城镇）。在托洛茨基的指挥下，新组建的红军在6月平

息了捷克军团的叛乱；此后，又击溃了波兰军队的进攻。

对苏维埃政权威胁最大的是顿河-哥萨克地区的反苏维埃活动。1917年10月，哥萨克独立政府成立，率先组织军队抵抗新政权。当时，在俄国境内分布着13支哥萨克部队，超过450万人，5300万公顷土地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各反对派想把哥萨克变成反苏维埃政权的堡垒，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首领都来到这里，他们号召全国各地的反对势力汇集到这个地区，1917年11月在顿河地区组成了反苏维埃的志愿军团。到了1918年8月，苏俄境内成立了至少30个反对派政府，但陆续被苏维埃政权摧毁。原沙俄元帅高尔查克组建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对苏维埃政权构成严重威胁。1919年3月，高尔查克率领40万白军向苏维埃政权进攻，一度占领了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一带。11月，在红军的反击下，白军节节败退，高尔查克试图逃往中国，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7日，高尔查克被苏维埃政权处死，尸体被抛入冰窟。

另一支反苏维埃的重要武装力量是由邓尼金任总司令的“志愿军”。邓尼金在南俄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他率领十多万军队在1919年11月直逼莫斯科，遭到红军的全力反击；邓尼金的军队溃败，其政权亦随之垮台。1920年4月，邓尼金流亡英国，写了五卷本著作《俄国内战史》，详述苏俄内战经过；1926年定居法国，成为“世界各地200万俄国流亡者的精神领袖”。希特勒上台后，邓尼金谴责其独裁行径；二战爆发，邓尼金再度流亡。1941年，纳粹德国侵犯苏联，邓尼金号召全球各地的俄罗斯人民支持苏联政府进行卫国战争，为民族而战。1947年8月7日，邓尼金病逝于美国。2005年10月，鉴于邓尼金在二战期间的爱国行动，他以“爱国将领”的身份被重新安葬在莫斯科，俄罗斯政府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见智仁编著《千年俄罗斯的世纪轮回》，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2月出版）。

俄罗斯幅员辽阔，各地的民族主义也广泛加入反苏维埃阵营。在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格鲁吉亚、哈萨克、土耳其斯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克里米亚和巴什基尔等各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就已经成立了各种民族议会和政府。十月革命以后，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自治派与民族主义派的政党和组织纷纷主张民族自决。如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主张与苏维埃俄国分离，建立“独立的”乌克兰资产阶级国家。这时候，苏维埃也加紧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政权，阻止民族主义分离。为了怀柔少数民族的情绪，苏维埃政权发布了关于俄国人民权利的宣言（1917年11月2日），表达了四个原则：俄国所有人民的平等和主权；自决的权利（包括脱离或创建独立的政权）；消除所有民族和宗教限制以及特权；整个俄国领土的少数民族和种族团体可自由发展。⑧1917年12月3

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乌克兰人民书》。这个文件实际上阐明了苏维埃政府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政策——

俄罗斯社会主义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再次确认凡是过去受沙皇政府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都享有自决权，直到这些民族和俄国分离……或同俄罗斯共和国缔结建立联邦或其他类似的相互关系的条约的权利。

## 第二部分 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斗争

### 5. 十月革命后的政治动荡和反苏维埃…

我们人民委员会无保留无条件地立即承认有关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一切事项。⑨

乌克兰的临时政府（民族主义领导中心）不相信苏维埃政权的表态，不予理会，而且与之开战。于是，苏维埃政权决定要消灭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府。12月11-12日，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同时，红军在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府的战争中取得全面胜利。从1917年12月到1918年2月，几乎在乌克兰全境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到了1919年秋天，邓尼金的白军又占领了乌克兰的大片土地，红军被迫撤退。不久，红军击败邓尼金的白军，收复了主要失地。其间，各种政治势力和武装力量也在乌克兰展开角逐，形形色色的政权更迭达十多次，局势一片混乱，如此状态一直持续到1920年。1920年4月，波兰入侵乌克兰，苏维埃著名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后在1937年5月以莫须有的“叛国罪”被斯大林枪毙）率领红军进行反击，并一直打到华沙。经过反复激烈的争夺，乌克兰终于建立了一个稳固的“苏维埃实体”。1922年，乌克兰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反过来入侵波兰。1939年9月，红军著名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在1937年5月以莫须有的“叛国罪”被斯大林处决。苏联与德国签订瓜分波兰的秘密协议，其中苏联侵占了波兰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俘获波军官兵约二十五万。1940年5月，根据贝利亚提议，斯大林决定，政治局同意，苏联政府将二万二千多名波兰战俘杀死，其中一部分军官的尸体被埋于苏联境内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此乃震惊世界的“卡廷大屠杀”。⑩

白俄罗斯的形势也较为复杂。民族主义政府（白俄罗斯拉达）是在1917年7月成立的。12月，明斯克（白俄罗斯首府）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2月17日，“白俄罗斯拉达”宣布白俄罗斯独立，由于势单力薄，在苏维埃的镇压下不堪一击。白俄罗斯民族主义分

子于是逃到德国军队占领下的邻近地区，寻求支持。1918年2月21日，德国军队攻占了明斯克，并摧毁了白俄罗斯境内大部分地区的苏维埃政权。但过了不久，苏维埃政权又重新建立。

北高加索穆斯林地区的情况同样复杂。1917年11月20日，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告劳动穆斯林书》——

俄国的穆斯林们，伏尔加河流域和克里米西的鞑靼人，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的吉尔吉斯人和萨尔特人，外高加索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高加索的切禅人和山民，所有那些清真寺和祈祷堂遭到俄国沙皇和压迫者的损毁，信仰和风俗被践踏的人们：从今天起你们的信仰和风俗，你们民族的和文化的机构都是自由而不受侵犯的了。你们可以自由地、不受干涉地安排本民族的生活。你们有权这样做。你们的权利，像俄国所有民族的权利一样，受到革命及其机构——苏维埃的全力保护。请你们支持这个革命以及它的全权政府。

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十分尖锐。这个地区的山民中的反对力量由王公、教士、牧主、工业家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领导，他们号召保卫穆斯林的民族利益和宗教利益，于1917年12月宣布成立“高加索山民联合同盟”，这实际上是一个泛伊斯兰组织。这个组织受到邻国土耳其的影响，土耳其一些政治力量向山民保证，“把高加索的穆斯林民族从俄国的桎梏中解救出来”。1918年1月，北高加索穆斯林宗教机构的领袖号召山民起来反对俄国，在高加索建立穆斯林的“伊斯兰法典的君主国”。在外高加索，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苏联红军的创建者托洛茨基。1929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1940年，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所派遣的刺客杀死。

## 第二部分 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斗争

### 6. 十月革命后的政治动荡和反苏维埃……

阿塞拜疆等地的民族主义政党也结成一个反苏维埃同盟。

克里米亚的重要反对势力是鞑靼穆斯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米里·费尔卡”，这个党由一些克里米亚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教师和教士）组成，他们在土耳其上过学，在那里受到泛穆斯林主义的教育。克里米亚的民族主义组织积极开展活动，旨在使克里米亚从苏维埃俄国彻底分离出去，于1917年10月成立了“克里米亚军事革命委员会”，并向布尔什维克宣战。布尔什维克军事力量打败了反对势力，1918年初在克里米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和俄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在土耳其斯坦也有反苏维埃的民族主义组织。经过激烈的战斗，这些组织也被苏维埃政权歼灭了。

1919年9月，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击退了爱沙尼亚反对派武装对彼得格勒的进攻。1920年2月，十月革命后，苏俄爆发内战和严重的饥荒，数百万儿童流离失所。

苏维埃政府与爱沙尼亚签署了和平协议；随后在7月和8月也分别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签订和平协议。随着这些协议的签订，苏维埃政府承认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独立。

就如列宁所说，从1918年至1921年，“整个俄国都掀起了内战的浪潮，而我们到处都能异常容易地取得胜利”。在列宁发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指令下，苏维埃地方政权迅速地在原俄罗斯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上纷纷建立起来。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苏维埃政府陆续遣散军人，但遣散加剧了农民的反抗浪潮。成千上万的士兵经历了多年的战争之后侥幸回到家乡，他们没有任何职业和财产，生计成为严重问题，于是很多人沦为“匪帮”，引发了新一轮的暴乱。据统计，整个国内战争（包括与外国军队作战）期间，红军的死亡人数高达一百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另外，有数目庞大、难以准确统计的人死于内战和饥荒，“要是把战争的牺牲者（无论是白军还是红军），以及可怕的大饥荒的死难者都加在一起，总数可能不会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条战线牺牲者的总和。”（诺曼·戴维斯：《欧洲史》第95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到了1922年，有550万被遗弃的孩子流浪各地，大多数可怜的孩子靠乞食或轻度犯罪为生。在内战和抵抗外国军事干涉的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可以说，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苏维埃政权仅仅依靠工人的力量，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战争期间，苏维埃政权的一些错误做法，却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感情和侵犯了他们的利益。

## 第二部分 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斗争

### 7. 战时共产主义（1）

协约国的军事干预和内战连绵，令苏维埃政权疲于应付。值此关系到政权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苏维埃政权实施了一种急进的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时间大约从1918年6月至1921年3月）。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就是实行全面的工业国有化和粮食垄断，禁止私人进行粮食买卖，禁止商品交易，乃至取消一切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商业行为。苏维埃政权甚至幻想通过“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为了保证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要在战争时期使用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庭等），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采取一系列强制性措

施，以维持政权的生存，渡过难关。而强行征收粮食，则最能体现“战时共产主义”期间，粮食严重缺乏，市民冒着严寒排队等候食物。

“战时共产主义”的特点。从1918年春天开始，苏维埃俄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和经济危机，工厂由于缺乏原料和燃料而陷于瘫痪状态，大批工人遗弃了工厂，到农村寻找食物（到了1921年，莫斯科流失了一半的工人，而彼得格勒则流失了三分之二的工人），甚至连军队也吃不饱。极端贫困和粮食短缺令城市居民有冻馁之虞，成百万城市居民不得不携带着他们想方设法弄到的商品到农村去换取土豆或面粉——那是一个‘背大包’的时代，男人们和女人们坐着火车前往遥远的乡村，肩头背着一个大包，到处寻找面包以及其他食物。“面对日益严重的困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颁布了粮食由政府垄断的强制性法令：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征集粮食，每一个拥有粮食的人要在一周之内交出全部余粮，‘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收粮站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十年以上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除去种子和必需的口粮之外，农民不得占有和匿藏任何粮食，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将余粮出售给政府，对违反法令的农民可以‘采取暴力行动’。由工人和士兵组成的武装小分队，被派到各地农村监督收割，以防农民私藏粮食。这场由军队介入的严厉无情的强征粮食之战，用列宁的话说是一次‘十字军讨伐’。彼时的俄罗斯大地，内战频仍，兵燹四起，田园荒芜；广大的农民正陷于极度的贫困和饥饿之中，啼饥号寒之际，焉有粮食上缴！大抵一些稍为宽裕的中农（他们也是自食其力的生产者），尚有少量维持生计的存粮；这些少量的存粮，一部分是供自己果腹之用，另一部分要拿到市场上出售，通过交换以获得他们的生产所必需的钱。而真正囤积余粮的只是少数富农。苏维埃政府一律征无赦，激化了与农民的矛盾。于是由富农带头反抗强征粮食，一时抗征风潮异常激烈，仅仅在1918年，就发生了二百多起农民反抗事件。1919年12月，苏维埃政府再通过一项决议，‘明确地要求加强征收措施，把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农产品；实际上，这些措施打击了几乎全体可能拥有消费方面的‘剩余品’的农业经营者’。强行征收所有农产品，严重侵犯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给农民造成极大的伤害，使得农业生产大幅度地下降（在1920年前后，苏俄的农业总产量比1913年下降了40%）；一方面是严重缺粮，另一方面却是粮食黑市交易猖獗。1921年夏，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一带、高加索和乌克兰等地区，庄稼全部旱死，颗粒无收。人祸加上天灾，导致饥荒大面积发生，仅伏尔加河流域的饥民就有2500万。在被饥荒袭击的地方，无粮的农民将大批牲畜和能够找到的动物杀死以充饥，出现了因饥饿而精神错乱、集体自杀、杀害婴儿甚至人吃人的现象。据苏联官方统计，1921-1922年，有9000万人口陷于饥荒，4000万人民营养不良，500万人死于饥荒。英国作家H G 威尔斯（史学名著《世界史纲》的作者）在1920年秋天游历了俄罗斯

（在莫斯科见到了列宁），他在文章中描绘了亲眼目睹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真实情况：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批人被杀害；到处是饥饿的人民；商店因商品严重短缺而关闭；城市毁坏，房子的木头被拆下来做柴火烧。威尔斯满怀忧虑地写道：“俄国是现代的，是具有西方风格的文明社会，但又是一个最不守纪律而且最不稳定的强国；它现在正处于濒临死亡的剧痛之中。这种灾难的直接原因就是现代战争，战争使国家筋疲力尽。正是这些情况，促使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俄国的崩溃绝对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就将会是不可逆转的：俄国所剩下的东西，将会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因无人使用而生锈的铁路，城市成为废墟，乡村一片荒芜；这样，统治者的痕迹也将随之消失。……惟一有可能阻止这种全面崩溃的就是现在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它必须获得美国和欧洲的援助。无论愿意与否，西方都必须向布尔什维克提供援助。”《一封关于饥荒的来信》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触目惊心的状况——

## 第二部分 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斗争

### 8. 战时共产主义（2）

可能你已经听说了关于俄国的饥荒，你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我就要饿死了！”你从来没有忍受过饥饿。是啊，在这里，无法言表的饥饿正在一步步地杀人。……超过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十分之九的人们已经几个月没有粮食吃了。起先，他们把残存的花和各种杂草混合起来吃，之后他们就只有草根吃了；接着，当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可吃的时候，他们就煮泥土吃。……人们吃掉了所有橡子，现在的食物则是煮过的桦树皮。孩子和年老的人最先死去。现在，靠着最后的力气，男人们在为他们自己挖掘大片的坟墓——这是兄弟的坟墓，他们这样称呼。伏尔加河流域大型的村庄，一般都有两三千名居民，每天要死去三十多个人。这个数字只代表了一个大体情况。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尸体从坟墓中被挖出来并被吃掉，母亲将他们的孩子丢弃在森林中，为了逃避那可怕的吃人的诱惑。……直到下一个季节的每一天，死亡的圆圈将会不断扩大，扩散到越来越多的地区，在那里根本没再剩下什么人类可以食用的东西了。

苏俄严峻的大面积饥荒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欧洲各国政府的代表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召开会议，准备救济俄罗斯饥民，但提出条件，苏维埃政府必须承认沙皇俄国时期所借的外债。美国政府也参与救灾，美国救济总署立即实施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救济（从1921年9月至1923年7月，美国救济总署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地区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

暴力强征粮食引起了农民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以及社会的广泛动荡；越是无限制地执行强征政策，农民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就越紧张。在1920年秋季至1921年冬季，当外国武装干涉实际上已被打败和内战基本结束之后，农民的反抗仍然在许多地区不断发生。强征滥征严重威胁到农民的生计，破坏了正常的粮食生产，进而影响到对城市的粮食供应。1921年2月，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城市和其他工业中心爆发了罢工浪潮，“这些罢工不是针对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是受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之苦的工人们不满情绪的一种表现形式”。在2-3月间，一场更大的政治危机发生了，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水兵在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发动叛乱，这支部队和工人联合起来，与苏维埃政权抗衡。无政府民粹派的思潮在“喀琅施塔得分子”中占主导地位，他们提出“无党派苏维埃”的政治主张；在经济方面，他们的纲领主要是要求贸易自由和尊重农民的所有权。于此国家动荡之际，“喀琅施塔得分子”得到各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包括海外流亡者）的支持。苏维埃政权以武力平息了这场叛乱，但引起叛乱的成因却值得深思，“发生叛乱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部分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士兵）的不满情绪，在有些地方已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有鉴于形势的险峻，列宁在1921年初增加了与农民代表的接触，听取民情，了解到农民的苦况，“他越来越认识到对农村所犯的错误”。列宁承认，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错误的，使布尔什维克党遭受到的失败比它在战场上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使苏维埃同许多人民阶层的关系严重地恶化了。苏维埃政权终于意识到“战时共产主义”对扭转局势并没有多大的帮助，而杀鸡取卵式的强行征收政策未免失于法度和理智，于是及时收手，停止强征粮食，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措施有：恢复农副产品的自由买卖和放弃对农民强行征收粮食；允许个体小商业和小工业适当地发展，允许自由贸易；同时，给予外国资本一定限度的投资条件（如对一些工厂实行“租让”）。新经济政策“作为一项从战争的、镇压的手段向和平的、经济的方法过渡的政策”，对缓解政府与农民的矛盾和社会危机，对陷于崩溃的农、工、商业的重新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列宁在纠正布尔什维克党同农民的关系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只有走这条路才能使国家从饥饿和经济崩溃中解救出来”。从1922年起，农民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善，但只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很多年以后，收成才超过战前的水平。

苏维埃政权在建立初期，对俄国的主要宗教东正教进行排斥，认为东正教会是一种威胁性的颠覆力量，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1924年）。他们都主张用非常手段清除反对派。

严格限制各种宗教活动，打击神职人员，剥夺教会的财产，仅仅在1920年，就将五百多座修道院收归国有。官方在发给学生的证件中删除了宗教信仰的内容，还颁布法令禁止

在国办的学校内进行传教活动。这一系列做法无疑是不明智的，结果引起了教徒的强烈不满，导致宗教界与政府的严重对抗，特别是东正教会，一度卷进了反对派的活动。内战期间实行严厉的反宗教政策，很多东正教神职人员被“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镇压。契卡一位高官向捷尔任斯基（契卡最高头目）献策：“除了肃反委员会，没有任何机构能摧毁宗教。”于是契卡大开杀戒。面对残酷的镇压，东正教大牧首吉洪发表文告愤怒抗议：“停止你们的血腥镇压吧！你们的行为是残忍的，你们迫害基督教会和教徒，修道院和东正教教会的财产被你们以人民的名义掠去，……你们曾许诺要在俄罗斯大地上保障人权和真理，保证信仰自由和正常的秩序，可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罔顾法纪的人肆无忌惮的专横和赤裸裸的暴行。”1921年俄罗斯发生大饥荒，饿死者数百万。当年8月，大牧首吉洪号召所有的信徒向在饥饿中挣扎的广大饥民施以紧急救援；他还请求当局准许成立旨在救助饥民的宗教委员会，而当局非但不同意，还将教会的行为定性为阴谋破坏。一直到1927年以后，苏联政府才纠正了一些过激的错误做法，并通过法律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东正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才有所缓和。但是，国家对宗教活动仍有诸多限制。在斯大林大搞阶级斗争和大清洗的年代，又再严厉打击教会，大批神职人员被捕。宗教信仰一直以来是苏联人民重要的精神生活内容，本来，正常和正当的宗教活动是苏联社会安定的润滑剂，而斯大林却视宗教为异端，蛮横打击，必然引起强烈对抗。其实，苏联的东正教会总的来说还是爱国的，例如在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的时候，东正教会立即发动教徒募捐，号召教徒积极参加卫国战争。东正教会因此声望日隆，信徒大增。

## 第二部分 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斗争

### 9. 查禁反对派报刊和组织（1）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和《苏联国内阶级斗争》两书都详细记载了取消各党派及资产阶级报刊的过程。鉴于各种反对力量有自己的舆论阵地，苏维埃政权在十月革命以后就开始查禁反对派的报纸，而资产阶级的报刊原则上也禁止发行。1917年10月，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禁止出版的报纸就达二十多种，其中有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孟什维克的《日报》等。10月2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出版法令，指出舆论控制的重要性：“谁都知道，资产阶级报刊是资产阶级手中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特别是在工农新政权刚开始巩固的紧急时刻，听任这种武器留在敌人手中是不行的，因为在这种时刻，它同炸弹和机关枪同样危险。”11月4日，列宁在《关于出版问题的发言》中指出：“我们从前就说过，我们一旦取得政权，就要封闭资产阶级报纸。容许这些报纸存在，我们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我们不能让资产阶级有诬蔑我们的机会。”但列宁希望不是用粗暴的方法，而是

要订立法律来查禁。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出版监督委员会，还在一些印刷厂设置了监督委员。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有一个出版新闻科，“是对资产阶级新闻采取压制措施的专门机构”。除了查封反对派的报刊，还采取另外一些措施：勒令报纸短期停刊、禁止印刷某些期号、禁止登载反对派的文章、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营的印刷厂进行检查等等。例如，《人民言论报》、《团结》、《和平、面包和自由》、《革命警钟报》以及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等报刊登载了一些反对派人物的文章或“对苏维埃进行诽谤”，军事委员会根据情节的严重性进行惩罚，或直接在印刷厂停止这些报刊的印刷，或扣留下来，或禁止出售；查封了《革命警钟报》，没收其财产归苏维埃政权所有。逮捕了《人民意志报》、《劳动言论报》、《工人事业报》等报纸的领导和编辑，因为这些报纸刊登了号召举行反政府游行的呼吁书和文章。其他地方的苏维埃政权也采取了这类查禁反对派新闻的措施。如在哈尔科夫，查封了报纸《南部边疆》和《俄国生活》；在土耳其斯坦查封了《土耳其斯坦通报》并没收了印刷厂；在莫斯科审判了“将报纸用于反苏维埃”的《俄国晨报》编辑和出版人。1917年12月，设立了“出版特别革命法庭”，负责侦查和审判“利用报刊反对人民的罪行和过失”。该法庭审理“报刊文字”案件时所采取的惩罚措施主要有：对违禁的报刊勒令停刊或禁止出售；没收印刷厂或报刊的财产。1918年1月又发布“关于出版革命法庭”的新法令，明确规定出版革命法庭的职权范围不仅是审判报刊文字，也包括审判犯有“言论罪”的人；法庭对这些人可处以监禁、剥夺权利或给予其他惩罚。在当时，因言获罪者在被审判时尚可以请辩护人，而辩护人一般从“出版自由”的角度为之申辩。苏维埃政权的起诉人则批驳“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辩护士”，说只是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劳动人民才有了真正的出版自由；而在资产阶级制度下面从来就没有出版自由，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出版自由。根据苏联官方的资料，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18年2月的四个月中，被革命法庭审判的有十九家报纸，逮捕了十八名编辑和报纸工作人员。”实际上，从1917年的冬天到1918年的春天，苏维埃政权没有封闭所有的资产阶级报纸。因此，当立宪民主党解散时，这个党的报纸《俄罗斯自由报》还在继续出版”，而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这张报纸终于被勒令停刊。从1921年起，对各个“民主党派”及其报刊的镇压越来越严厉和坚决，到了1922年，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和组织都在查禁之列。

1920年至1921年间，孟什维克党人在莫斯科和一些地区甚为活跃，他们发行各种小报，积极参加地方苏维埃的选举，获得了几百个席位；孟什维克党人又利用在工会组织中的地位，对彼得格勒的罢工起到很大的作用。而社会革命党人则在一些地区对农民的反抗活动给予大力支持。1921年7月，苏维埃政府指定立宪民主党的几个知名人士加入全俄救济委员会，参加国际救济俄罗斯灾区的募捐工作。在此过程中，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资产阶级成员被指直接与外国谈判，企图组成“反对派”。8月27日，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解散全俄救济委员会，并逮捕了其中主要的资产阶级成员，取缔立宪民主党。其实，列宁并不是一贯主张对反对派一律采取镇压手段的，他有时甚至希望以怀柔政策使反对派归化。例如，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战争时期和1921年以后镇压反对派的做法就与列宁的立场发生重大的分歧。列宁曾在1918年11月谈到孟什维克表示放弃反苏维埃的态度时说：“当局势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我们的时候，还一味对他们采取镇压和恐怖的策略，那是同样荒唐可笑的，甚至更加荒唐可笑的……我们现在不应该推开他们，相反地，应该容纳他们，使他们能够同我们一起工作。”列宁甚至在1922年还考虑过“重新给予一定程度的出版自由”。

## 第二部分 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斗争

### 10. 查禁反对派报刊和组织（2）

但事实上，对反对派的镇压一直没有停止。1922年2月，社会革命党47名领导人被指控“阴谋反对苏维埃”而遭到逮捕；6月，对这些被告人进行审判，大部分人判了刑。至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再也难以进行反对活动，“民主党派的合法存在越来越成为一种空想。它们的领导人不断被捕，大多数人终于逃亡国外；它们的报刊虽然在这几年间仍在俄国流传，但再也不能在俄国出版。……因此，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很快地就成了唯一的党，原先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建立起来的政治关系中给民主党派以一定地位的尝试失败了”。

### 苏维埃肃反机构的建立

十月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并迅速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地建立起苏维埃的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革命法庭），开始了逮捕反苏维埃分子和查禁反对派报刊的行动。在审理案件和作出判决时，不是依据成文法（当时苏维埃政权还没有成文的法律），而是根据“革命法制观念”。但初期建立起来的审讯-侦查机关不能保证高效率地审判反对势力，于是在1917年12月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政治警察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写名称中译为“契卡”）。肃反委员会下设三个局：情报局、组织局（组织全俄国的肃反斗争和分支机构）和行动局。另外，又成立了一个采取军事镇压措施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就预见到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采取国家强制措施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十月革命以后，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是“与人民为敌”的政党，遭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的批评。列宁回应批评：“革命阶级在同实行反抗的有产阶级作斗争时，对于这种反抗应该加以镇压；我们也要用有产者镇压无产阶级的全套办法来镇压有产者的反抗，因为其他办法还没有发明出来。”1918年8月30日，彼得格勒“契卡”领导人尤里茨基被大学生杀死；同一天，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参加群众大会的列宁被社会革命党女党员卡普兰开枪行刺，身受重伤。四天后，卡普兰被枪毙。在此期间，陆续有布尔什维克的上层人物被刺杀。面对不断发生的政治暗杀事件，9月5日，苏维埃政权通过《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宣布要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逮捕和草率的处决行动，目标就是社会革命党人、贵族阶级的代表、金融阶层、沙皇时代的军人以及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自由职业者……契卡成为‘红色恐怖’的先锋。”“战争期间的特殊环境迫使苏维埃政府决定较多地使用枪决来对付反革命分子”。“契卡可以不审判敌人，就将其杀死”，不管这些敌人是直接的还是“想像”的。根据契卡的官方档案统计，1918-1920年间，有12733人被处死，这个统计只是总数的一部分，不包括契卡在各地的分支机构行动。而历史学家估计，在1917年至1922年期间被处死的实际人数高达14万，尚不包括内战死亡者、野蛮的报复、大屠杀和其他罪行的致死。1923年，作家扎祖伯林以契卡镇压为背景，创作了小说《契卡人》（发表后受到严重批判，直到苏联解体后才正式出版）。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法国，曾经有断头台和公开的死刑。在这里，我们使用地下室，秘密处死。公开和秘密的区别是：公开处死一个罪犯，甚至是最危险的罪犯，也会为死者举行献祭仪式，的确，那是英雄般的荣誉。被处死者可以进行公开的道德宣传，可以留下遗言，完成最后的遗愿，并知道确切的死期；他们的家人会收到尸体进行火化。这种毁灭并不彻底。而秘密处死是在某一个隐蔽的地方或地下室进行，没有裁决或宣判，没有舞台和观众，这种突然死亡对敌人具有粉碎性的效果。它是一台巨大的、无情的机器，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入它的牺牲者，像一台绞肉机把他们碾成肉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死期，没有尸体，没有遗言，没有坟墓。只有虚空。就这样敌人被彻底消灭了。”从1917年5月至1918年7月，著名作家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总题，发表了约80篇文章，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契卡整肃的对象是没有界限的，已经抓了很多知识分子。《新生活报》因为刊登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文章”被查封了。契卡对言论的限制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令高尔基感到愤怒，“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是为了能够说出和写出真情”。高尔基多次找列宁，向列宁投诉：很多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被逮捕了！由于高尔基的奔走呼吁，拯救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生命。高尔基又在一篇文章中谴责契卡等机构在俄罗斯人民正面临饥饿、动荡和战乱的时候大肆滥杀滥捕：契卡“对待俄罗斯就像是对待一个实验场；对待俄罗斯人民就像是对待注射了斑疹伤寒的马匹一样，只是为了恢复他们血液里的免疫血清。他们就像是疯狂的科学家，在俄

罗斯人民身上实施着残酷和不人道的实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匹饥饿而且筋疲力尽的可怜马儿，可能随时会倒下死掉”。高尔基的批评实在“不合时宜”，于是他被布尔什维克政府客气而又不容商量地“请出”去国外治病。到了30年代初，高尔基忍受不了乡愁的折磨，倦极思还，斯大林适时地向他暗示：苏联官方文学的第一把交椅虚位以待；当高尔基终于返国，斯大林确实给予厚遇。高尔基也以实际行动报答斯大林，发表文章对其歌功颂德，之后，两人关系非常密切。1934年，高尔基当上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这位曾经勇猛一时的公共知识分子、社会批评家，当年的独立风骨已荡然无存。一前一后之高尔基，相隔不过十余年，却判若两人。

## 第二部分 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斗争

### 11. 查禁反对派报刊和组织（3）

1919年，考茨基在一本谈论“恐怖主义”的书中曾批评肃高尔基。

高尔基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总题，发表一系列文章谴责在革命的过程中滥用暴力。反政策是“革命的黥武主义”，肃反委员会“具有专断的权力，可以宣布任何被控告的人的罪名，随意枪毙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在‘反革命’这个集合词下，把各种各样的反对者都包括了进去，不问这是发生在哪一类人中间，产生的动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手段，抱的是什么目的”，总之，枪毙是肃反委员会的全部智慧；肃反的扩大化很容易陷入“诉诸暴力的雅各宾的恐怖主义”。他又批评革命后产生了新的官僚阶级，出现了独裁倾向；这个新阶级压制知识分子，钳制言论，侵犯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也说过要警惕对雅各宾思想的留恋。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也指出，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主义有相似之处。当时，雅各宾派的思想确实对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革命领袖未能摆脱集权主义的观念。卢森堡担心这一类型的政治关系会导致国家生活瘫痪，人民缺乏生气，官僚主义肆虐和国家机器对公民言论自由的压制。但卢森堡是热情支持十月革命的，她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要求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像变魔术那样创造出最美好的民主政治、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

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初，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遗留下来的很多行政部门和机关的官吏，甚至银行、铁路、邮电、医院、工厂、学校、军队中的不少职员、工人、教师、学生、军人都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反对势力号召进行广泛的怠工，并组织了领导罢工的国家机关职员协会联合会中央罢工委员会。劳动者中弥漫着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常常以

暴力行动、甚至反抗形式表现出来……同时，由于城市缺少食品，也促使消极怠工的发展和工人流向农村。因此工厂和矿山中没有了劳动者”，全国性的停工造成严重的原料和燃料的缺乏。全国各地广泛的罢工、怠工令苏维埃政权陷入困境。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表声明，要罢工怠工者“服从政府，继续工作。如果拒绝，则按盗窃人民财产罪论处”；罢工被视为背叛，等同于军队的兵变。但是罢工、怠工潮还在继续。这个时期，政府开始建造“强制劳动营”和集中营，并颁布决议，命令把罢工、怠工者“编成受惩罚的工人队，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肃反委员会是“全能”的镇压机器，它首先打击的目标是报刊等舆论（如取消各反对派的报刊）、立宪民主党、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罢工怠工者；其主要任务是在全俄范围内镇压、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和罢工、怠工行为，“不论这些企图和行为来自何人”，都要“作无情的斗争”；将一切“反革命分子”和罢工、怠工分子送交革命法庭审判。捷尔任斯基亲自指挥，逮捕了罢工委德国著名革命家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就俄国革命问题展开论战。

委员会的领导人 and 众多罢工、怠工者。此后，苏维埃政权还采取了彻底改变工会职能和性质的措施，作出决议，实行“工会国家化”，规定工会不能作为一种组织上独立的力量，工会应当成为国家机器整体的一个附属部分，由中央行政机关直接领导。“工会国家化”事实上把理应由工会行使的职权上交给国家行政机关。由于决议的内容难以被大部分劳工和工会领导人所接受，故遭到强烈的反对。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担心肃反扩大化和镇压失控，坚持肃反委员会应该归司法人民委员部领导，有政治背景的逮捕必须事先取得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意。但司法人民委员部却决定，肃反委员会可以独立进行逮捕和枪决，作为一个“制止反革命的政治机构，它有权制定进行斗争的措施”。于是，肃反委员会不特被赋予“巨大的权力”，而且弊在侦查案件时每每越过法律的界限，如可以任意搜查私人住宅。捷尔任斯基说：武装人员闯入私人住宅、剥夺“罪人”的自由是一种灾祸，不过我们现在必须使用这种手段来保证我们取得胜利。而列宁主张宽严有度，革命法庭对不是很严重的反抗行为应从轻量刑，他说：“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逮捕人。是的，我们是在逮捕人……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采取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还没有采取法国革命者采取的那种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断头台，我希望我们将来也不采取这种恐怖手段。我希望不采取这种手段，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每逮捕一个人，就对他说，如果你具结保证今后不再怠工，我们就释放你。”到了1918年4月，经过肃反委员会的严厉打击，罢工、怠工潮终于平息。列宁一方面认为肃反机构是一种“必要的恶”，另一方面对它的活动是不大放心的，他经常过问具体的案情，监督肃反委员会是否“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但实际情况却是，列宁并不能完全掌控肃反机构的运作。9月1

9日，苏维埃政府正式决定授予契卡可以不向革命法庭报告就行使逮捕和处决的权力，“这就把过去所做的一切合法化了”，“契卡就是负责执行这种革命恐怖的机构，它有权力消灭一切反对它的人”。就如一位契卡领导人所说的，在“革命恐怖”时期，“契卡完全独立地进行搜查、逮捕和枪决，只在事后才向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执行机构报告”。契卡的权力无限扩大，“肃反”的范围也任意扩大，已远远超出对它所规定的限制，它不但镇压反对派，甚至对稍微表示不满的人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契卡在苏联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劳改营”，其中有一些是专门关押青少年和儿童的。

## 第二部分 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斗争

### 12. 党内斗争和党内清洗（1）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以三个章节的篇幅重点分析了“党内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契卡不但要镇压党外反对派，而且还要密切注视党内反对派的动向。1921年以后，契卡的活动逐渐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个“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党内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它开始干涉党内生活，对党员进行监视，大搞“清洗”运动。仅在1921年，被“清洗”和“自动退党”的人数就占党员的四分之一，主要罪名是“个人野心、混入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用清洗来威胁党员，迫使他们保持沉默”，引起了广大党员的强烈反对。有鉴于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2年2月解散了契卡，另由内务部成立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行使原来契卡的职权。但是这种形式上的转换，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国家政治保卫局除了将一些刑事犯移交司法机关，对“政治罪行”案件则完全自行处置。而且它拥有比契卡更广泛、更专横的权力，它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越来越频繁地对党员进行干涉、调查，追踪和整肃党内的“分裂分子”；它直接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活动，扩大了对党内生活的干预，严重干扰了党内自由讨论、不同意见辩论的气氛。过去，即使在紧张的革命斗争年代，布尔什维克遇到重大或复杂的问题时，都会在党内“进行深刻的、细致的、尽可能公开的辩论以后，才作出决定。辩论不仅是非常公开的，而且持有不同于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意见的党员可以直接向全党提出。他们可以或者在党的机关报上，或者在适当的定期刊物或不定期刊物上发表他们的意见……按照这些原则，那些与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持不同意见的党员，就不是‘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对象”。列宁认为，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上辟出一定的篇幅，让大家交换意见”；对党的生活来讲，容忍不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抛开集中制……不要绝对服从纪律”是更为可取的。他早在1904年就指出，广泛交换意见，甚至进行各种倾向的论战，对党的生活是十分重要的。十月革命前后的两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不同意见讨论非常活跃，但当“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主导地位确立之后，党内自由讨

论制度就名存实亡了。在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些党员干部要求苏维埃政权更加民主化，却被大会否决了，“相反，代表大会赞成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政治局、组织部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就是这次大会设置的”。列宁在晚年力图纠正布尔什维克党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初期的一些极端偏激的做法，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明确划分党和政府的职能；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过于集中的权力实行严格的监督；加强法制；改组契卡，检讨肃反的失误；等等。列宁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始终不放心，他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评价是有反复的，而对斯大林的个人野心更是深怀忧虑，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他在接班人问题上犹豫不决。

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公开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列宁既要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一派进行斗争（他们在列宁逝世后继续结成同盟，组成党的领导核心的“三驾马车”），也与托洛茨基、布哈林在一些执政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在斗争中，列宁有好几次处于少数派的地位。

斯大林是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反对者。1918年4月，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成立，列宁发出电报表示支持。但时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发表声明，反对成立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斯大林提出强烈抗议，认为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不是取决于斯大林的态度，而是由乌克兰劳动人民的意志决定的。为了打击乌克兰人民的反抗，斯大林竟然发出指示，要采取毫不犹豫的行动，“把一些村庄化为灰烬，以儆效尤”。

1918年，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了一个“左倾”的党内反对派——“军事反对派”，伏罗希洛夫等苏维埃将领是军事反对派的骨干。这个派别公开活动，拒绝招募旧俄军事专家参加红军。斯大林被认为与军事反对派有密切关系，他在察里津前线担任领导时作出决定，解除了大批军官的职务，这个决定是同军事反对派的路线相符合的。由于“军事反对派”的错误决定，在内战期间，红军损失了很多战士。列宁严厉谴责军事反对派，斯大林被解除了在南方战线军事革命委员会中的职务。军事反对派的出现是富于象征性的，“它的活动方式表明，在这一时期，党的机关内部已存在着有组织的反对势力，它能够反抗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决定”。

## 第二部分 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斗争

### 13. 党内斗争和党内清洗（2）

在20年代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内还出现了多个政治派别，如“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

派”。党内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工会的作用问题上。俄共（布）著名的女革命家柯伦泰是工人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和代言人（其著作《工人阶级》是该派最完备的纲领性文件，已译成中文）。工人反对派的主要成员多数是工人出身的工会领导人，都是忠诚的革命志士。他们站在劳动者首先是工人及其工会组织一边，主张党内批评自由，批评对工会干涉过多，要求工人民主，把工人的管理权交给工会，使工会组织起到广泛的作用。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在一些方面是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文章中阐述的论点相联系的，表达了苏维埃工人阶级内一部分人的愿望和要求。但1920年至1921年严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特别是“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令列宁怀疑工人反对派的动机，促使列宁对工人反对派采取了一种特别严厉的态度。在列宁看来，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实际上是一种“工联主义”或“工团主义”的观点。列宁认为，国家正处于战争时期，形势紧张，现在“需要的都是步枪，而不是反对派。这是客观情况造成的，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但列宁明确指出，他的意思绝不是说用步枪来同反对派“辩论”，而是指对付公开的敌人。他也承认一些反对派的建议是合理的，只是“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鉴于形势特别严重，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1920年5月，列宁在莫斯科向群众发表演讲，站在讲台右侧的是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在斯大林执政初期，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先后成为斯大林的“敌人”，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加米涅夫被枪毙。20世纪30年代，这张照片公开发表时，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的形象已被“清洗”掉了。

十次代表大会曾制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禁止在党内成立任何有组织有政纲的政治派别。但这项决议中的一些规定是互相矛盾的，例如它又容许党内不同意见的辩论，并准备出版一种名为“争论专页”的刊物；列宁还建议，在党内发生“根本分歧”时，应该把“分歧意见”（实质上是反对意见）“提交全党”讨论，他要求在党代表大会上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一致时，持有互相对立观点的代表都应该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但是事实上，《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是限制党内公开争论的开始，“争论专页”也从未出版过，一言堂的确立，使党内的言论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把表示异议的党员开除出党），不同意见的公开争辩逐步消失了。由于“党员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的可能性受到许多限制，更加阻碍了党去克服自己的判断错误或思想上的毛病”。在列宁逝世后，这项决议更成为斯大林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和清除异己的有力武器，这或许是列宁始料不及的。

列宁与托洛茨基既是亲密的战友，又每每在政见上有互不妥协的争论（如在“不断革命”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在1920年3月底4月初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战时共产主义”的观点仍然影响着党的大多数代表，而关于民主和集中的争论引起了党内危

机。在一些决策性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布哈林同列宁产生重大的分歧。例如，托洛茨基主张，在非常时期，为了对付罢工怠工，劳动者要进行高强度的劳动，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强制的方法和措施；对逃避强制劳动的人“应当关入管教营或集中营”。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也认为，“劳动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偏见”。托洛茨基又提出实行“工会军事化”、“工人阶级军事化”。列宁反对托洛茨基的提案，而主张工会要完全服从国家机关。托洛茨基对强迫劳动的主张提出荒谬的解释：“说强迫劳动常常是没有生产效率的，那是自由主义最拙劣最卑鄙的偏见。成群的奴隶也是有生产效率的。对奴隶的强迫劳动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现象。”托洛茨基以奴隶制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认为采取劳动军事化是有理由的，只要这种军事化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决定的就行了。同时，托洛茨基又是“国家强制”的拥护者，他反对给工会组织以更多的自治权。他说，工人反对派“提出了一些危险的口号，他们把民主原则奉为偶像，他们把工人选举自己的代表的权利置于党之上，好像党没有权力来确保自己的专政，即使这种专政同工人民主有暂时的冲突……党必须维护它的专政，专政不是建立在工人民主的原则之上的”；只要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党”，就可以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永久存在下去。而“按照布哈林的说法，俄国工人阶级把党和国家的纪律强加给自己，党一方面与工人阶级是‘同一体’，但另一方面党又‘高于’工人阶级，这样在布哈林看来，党就有理由对工人群众实行强制，这种强制等于一种‘自觉纪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论点归结到这样一种思想，即党是绝对正确的，党‘本质上’高于群众，不论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采取什么做法。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论点还给布尔什维克党指定了一项新任务：党不再是听取群众的建议和批评、领导群众的先锋队，党负有对群众进行监督和强制的任务”。布哈林甚至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采取“无产阶级军事专政”的形式。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观点无疑是在破坏列宁主张的党内不同意见可以自由讨论的民主原则。所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没有通过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及其支持者的激进路线，否决了施行强制性劳动和“工会军事化”。列宁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党高层的一次重大危机。

## 第二部分 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斗争

### 14. 党内斗争和党内清洗（3）

在1920年底至1921年底，布尔什维克党内又再发生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政治斗争，列宁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托洛茨基继续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如果工会领导人持有与中央委员会不同的看法时，苏维埃国家有权解除他们的职务；在战争期间，这种措施还要不断加强。因此，托洛茨基不但主张“工会军事化”，实际上也赞成“工会国家化”。而列宁则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九次代表大

会否定了托洛茨基派的“工会军事化”而赞同“工会国家化”，是战争时期的非常措施，具有特殊的性质；在不再处于军事紧张的情况下，应该缓和国家与工会的关系。托洛茨基的提议遭到列宁的反对，但列宁的意见在中央委员会仅以微弱的多数（八票对六票）获得支持。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针对托洛茨基的文件，谴责“中央集权制和军事劳动化蜕化的一些现象：官僚主义、骄傲自大并对工会进行令人讨厌的干涉”。列宁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派（甚至党内很大部分人）把苏维埃国家和“工人国家”等量齐观，不同意把苏维埃国家说成是“工人国家”。他认为苏维埃国家的性质是非常复杂的，除了工人，还有其他阶级关系，这种国家性质使工人不得不拥有自己的组织，对执政党保持足够的独立性，足以“保护自己……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1922年1月，列宁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一项决议案《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 and 任务》，“在决议中，列宁着重指出工人阶级同苏维埃国家之间可能有‘利益的对立’，以及劳动者由于有必要打击官僚主义偏向和各种资本主义的旧残余，可能有理由采取‘罢工斗争’”。

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初，肆意介入党的事务，实质上是破坏了党内畅所欲言的民主生活，对持有不同1923年，轮椅上病重的列宁。直到苏联解体前，这张照片一直没有被公开。意见的党员造成威胁。列宁意识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不受约束的权力及其秘密警察手段对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的危害（契卡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作用逐渐违背了列宁“镇反”的初衷），于是在1922年3月27日俄共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谴责内务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胡作非为，但他没有坚决制止其僭越权力的活动，以致留下隐患。在列宁逝世前夕，党的行政机关和领导集团手中的权力已高度集中，党内不同意见的表达愈加困难，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党员要求恢复过去的党内民主制度，以调动党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1922年5月，52岁的列宁因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由于病情日趋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水晶棺中的列宁遗容。

严重，列宁已疏于问政，由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左右政局。契卡的创始者捷尔任斯基更是坚持镇压反对派和在党内进行“清洗”的强硬态度，他向政治局提出，每个党员都要向国家政治保卫局揭发被认为是“反动活动”的一切情况。在这段时间，因为提批评意见而被捕的党员不断增加，很多在地下斗争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或被开除出党或被撤销职务，党员人数大幅度减少。

健康状况不可逆转的恶化迫使列宁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他开始慎重地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当时的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列宁担心，由于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为此，列宁在1923年1月4日

给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信（口述“遗嘱”）中指出：“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但不幸的是列宁的建议未能切实执行。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斯大林的权力之路从此畅通无阻。斯大林攫取了最高权力之后，继承了契卡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政治暴力，并把暴力哲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斯大林就是利用内务部秘密警察在党内外进行大清洗。

#### 注释

①该事件的详细经过，参见《俄国政党史》第226-232页；《苏联兴亡史纲》第69-70页；《苏联兴亡史》第53-56页。

②《俄国政党史》，第43、46、47页。

③《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78-79页。

④《俄国政党史》，第48页。

⑤⑥同上书，第221页。

⑦《列宁全集》，第30卷，第202页。

⑧此“宣言”的条文见《列宁与俄国革命》第76页。

⑨见《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册第31-32页。此文收入《列宁全集》第26卷，第338页。

⑩关于卡廷大屠杀的详细死亡数字，见吴伟的论文《卡廷事件：苏波关系史上的一幕悲剧》，载《贺齐世荣先生八十华诞学术文集》，沈志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册，第36页。

1940年，斯大林政权撕毁列宁时代签订的协议，以政治手段和武力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将其纳入苏联版图，使苏联增加了174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86万人口。1989

年8月23日，是导致波罗的海三国被苏联侵占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波罗的海三国掀起要求重新独立的浪潮，有200万人民手拉着手组成跨越三国国界、长达六百多公里的人链，参加人数占三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被称为“波罗的海”之路。1991年2月，立陶宛宣布独立；8月，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相继宣布独立。从此，波罗的海三国正式脱离苏联；苏联亦在同年底解体。见《苏联兴亡史》，第456页；《苏联兴亡史纲》，第750、819页。

《列宁全集》，第27卷，第77页。

此数字见《列宁与俄国革命》，第145页。

《列宁与俄国革命》，第113页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95页。

见《苏联兴亡史纲》，第92页。

《列宁与俄国革命》，第145、148页。

同上书，第136页。

同上书，第161页。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510页。

同上书，第516页。

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政策的分析，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44、64、75页。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325页。

《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第281页；[俄]叶·米·斯科瓦尔佐娃著，王亚民等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同上书，第280页。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册，第 8 3 页。

《列宁全集》，第 2 6 卷，第 2 6 7 页。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册，第 8 8 页。

同上书，第 8 9 页。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 3 5 4 页。

《列宁全集》，第 2 8 卷，第 1 7 2、1 7 9 页。

转引自《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 3 7 3 页。

同上书，第 3 7 4—3 7 5 页。

见《列宁全集》，第 2 6 卷，第 3 3 1 页。

见《苏联兴亡史纲》，第 7 3 页。

《列宁与俄国革命》，第 9 2—9 3 页。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册，第 1 3 1 页。

转引自《列宁与俄国革命》第 1 0 4 页。

同上书，第 9 5 页。

见《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3 卷，第 5 6 页。

见《论俄国革命》，《卢森堡文集》下卷，第 5 0 6 页；人民出版社 1 9 9 0 年 1 1 月出版。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 2 4 9 页。

该决议有关条文见《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 2 5 9—2 6 0 页。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册，第 5 7—5 9 页。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5页。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397页。

同上书，第748页。

同上书，第403、419-420页。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99页、189页起。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542页。

同上书，第540页。

同上书，第541页。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89页、243页起。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567页。

同上书，第547-550页。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页。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553-554页。

详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58页。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8页。

### 第三部分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虚幻

#### 1. 游移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

托洛茨基（1879-1940）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元老，青年时代就已参加反抗沙皇独裁统治的革命活动。据托洛茨基政治传记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在《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中的记载：1898年，托洛茨基被沙俄政府逮捕，在狱中，他读了列宁刚刚出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这是他首次阅读列宁的著作。那时候的托洛茨基或许没有

想到，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会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紧密地连结在一起。1899年，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流放期间，托洛茨基认识了捷尔任斯基（此公在十月革命后任“契卡”即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清洗反对派不遗余力）。在西伯利亚，托洛茨基不断地读书写作，他写过评论尼采、左拉、易卜生、邓南遮、莫泊桑、果戈理、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高尔基等著名学者和作家的文章，显示了出色的文艺批评才华。但托洛茨基有更高远的理想，他要做一个改造社会的职业革命家，文艺乃其余事。这时候，托洛茨基开始接触马克思的著作，也读了列宁刚出版的《怎么办？》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外主办的《火星报》，他以革命为志业的决心更加坚定了。1902年，托洛茨基逃出西伯利亚，加入俄国国内的“火星派”组织。此时的列宁正流亡英国，亟需可用之材，遂要求托洛茨基出国参加《火星报》的编辑工作。于是托洛茨基马上赴英，从此结识了列宁，成为同志；并经常为《火星报》撰写文章，还被委派到法国、瑞士、德国的一些城市进行宣传活动，鼓吹革命。托洛茨基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普列汉诺夫的。普列汉诺夫是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的奠基者，有“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之称。他学识渊博，曾与恩格斯交往密切，在欧洲革命家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同是《火星报》的创办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两人均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底和杰出的领导才能，一时瑜亮，各有怀抱。普列汉诺夫对托洛茨基并没有好感，他对列宁器重托洛茨基不以为然，认为托洛茨基在《火星报》上发表的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只是花拳绣腿，华而不实。在托洛茨基加入《火星报》编委会一事上，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歧加深。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对党的性质和一些革命斗争问题的争论中，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结成同盟，而托洛茨基却加入了对抗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党内反对派”，成为“少数派”之猛将。托洛茨基激烈攻击列宁，说列宁“被权力欲所驱使”，又说列宁像法国大革命时代雅各宾党人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一样，会把革命引入歧途，“把党的委员会变成有无限权力的公安委员会”；并宣称“反对列宁的关于中央集权政党的观点”。①自己的“棍子”反过来打自己，这是列宁始料不及的。在这次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派）和“少数派”（孟什维克派）；大会结束之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建立。在这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普列汉诺夫只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暂时与列宁站在一起，而在其他方面两人始终难以融洽。更多时候，普列汉诺夫向孟什维克让步，批评列宁也相当尖锐，如说列宁搞“波拿巴主义”，“他将成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②而列宁是这样评价普列汉诺夫的：“1903年夏他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秋天时他左右摇摆，到年底他就成了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分子。”③后来，普列汉诺夫（1856—1918），他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有“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之称，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

汉诺夫成为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和理论家，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未来的敌人”。④而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4月留下的“政治遗嘱”（到了1999年11月才在俄国公开发表），分析了苏联党和国家将会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社会经济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崩溃危机，最后政权瓦解。八十多年后，历史应验了普列汉诺夫的准确预言。

由于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威胁要抵制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托洛茨基等人也停止为《火星报》撰稿，列宁被迫辞去《火星报》的职务。孟什维克接管了《火星报》，普列汉诺夫出来收拾乱局。但普列汉诺夫坚决不能容忍托洛茨基留在《火星报》，下了驱逐令，并以辞职相要挟。孟什维克害怕失去普列汉诺夫这个可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掣肘列宁的“同盟者”，惟有作出让步，托洛茨基的名字就从《火星报》上消失了。此后，托洛茨基逐渐疏远孟什维克。1904年9月，托洛茨基在德国慕尼黑发表《致同志们的公开信》，宣布同孟什维克绝交。⑤

这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当初托洛茨基投奔列宁，颇受重用，但他对列宁却是以怨报德，摇身一变，就成为孟什维克的得力干将，不旋踵又被孟什维克弃之如敝屣。在孟什维克的元老中，除了托洛茨基，其他人都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托洛茨基离开孟什维克，进退失据，成了无所依傍的革命“边缘人”，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布尔什维克的阵营中去，与列宁“相逢一笑泯恩仇”，再度合作。托洛茨基注定是一个政治悲剧人物，倘使他继续留在孟什维克，以其政治才华，或可纵横捭阖，雄极一时，然肯定逃脱不了被布尔什维克清剿；而后来卷入与斯大林之间的斗争，那就身不由己了，命运可以想见。

### 第三部分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虚幻

#### 2. 狱中酝酿不断革命论

1904年8月，托洛茨基在日内瓦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多伊彻说：“这本小册子的历史与传记意义在于，在以往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写的抨击列宁的文章中，这是最刺耳的一篇；这在于它首先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和散见于一百多页印得密密麻麻的谩骂文字上那惊人的历史直觉的闪光。”⑥托洛茨基在《我们的政治任务》的最后一章“雅各宾主义与社会民主党”中分析：雅各宾主义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乌托邦。罗伯斯庇尔及他的同志不相信民心 and 民意，“他们怀着病态的猜疑环顾四周，仿佛看见敌人从每条缝隙里钻出来。他们不得不在他们自己与周围的世界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分界线，而这条分界线是他们用断头台的刀刃划出来的”。⑦罗伯斯庇尔们的政治本能暗示，他们只能通过持久的暴力状态才能

延长革命高潮，“他们不惜大规模杀人，为他们的真理奠定基础。……他们对形而上学的革命概念绝对信仰，但他们绝对不信赖生气勃勃的人民”。⑧托洛茨基认为雅各宾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不妥协的：雅各宾派与调和主义进行斗争，社会民主党反对改良派的机会主义（如普列汉诺夫被归于机会主义），“假如在一个革命的法庭上指控国际工人运动的全部调和主义，那么马克思的狮子头就会第一个掉在断头台下”。⑨罗伯斯庇尔说：“我只知道两个党，一个是好公民的党，一个是坏公民的党。”⑩问题是公民的好坏是怎样划分的呢？是以党的标准，抑或以公民的标准？是以绝对服从为标准，抑或以不盲目服从为标准？托洛茨基指出，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主张要建立一个绝对一致的党时，“人们感到寒彻脊背的颤栗”。面对托洛茨基的指责，列宁回答：“革命的社会党人正是雅各宾派。”

1905年1月9日（星期日，俄历二月），彼得堡爆发大规模的工人和平请愿，遭到沙俄政府开枪镇压（苏联著名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在1957年创作的第十一交响乐“1905”，即以此事件为题材），由此引发了连绵不断的革命浪潮。流亡在日内瓦的列宁获悉“流血的星期日”事件之后，写了《俄国革命的开始》一文，宣称俄国工人阶级“已英勇开始的推翻俄国沙皇制度的事业，将是世界各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时，托洛茨基刚从慕尼黑到了日内瓦，他立即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以《彼得堡起义之后》为题发表。托洛茨基在文章中赞扬英勇的俄罗斯人民反抗沙皇的极权统治，认为君主立宪只是一种幻想。他号召人民推翻沙皇统治，“革命已然来了，她结束了我们政治的童年时代”。托洛茨基已无法忍受长期的流亡生活，他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2月，托洛茨基回到乌克兰首府基辅，几个星期后到了彼得堡，参加那里的秘密革命活动，并撰写了大量文章鼓吹革命（期间为逃避追捕，一度逃往芬兰，同年10月又潜回彼得堡）。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托洛茨基是以孟什维克主要代表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的，尽管他已公开声明与孟什维克绝交。当列宁在同年11月返回俄国领导革命时，托洛茨基已经是声誉卓著的“苏维埃强者”，其“人格魅力和思想力量的影响远不限于苏维埃和各社会主义政党”，有足够的力量与列宁分庭抗礼。

同年12月，托洛茨基被捕。坐牢期间，托洛茨基阅读了大量欧洲古典文学作品（可见沙皇的监狱比斯大林的集中营稍多一点“自由”），更重要的是，身陷囹圄的托洛茨基开始酝酿他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些早期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具有理论学说的“托洛茨基主义”，影响了世界各地相当一部分激进的革命家（包括中国的陈独秀等），并衍生出所谓“托派”。

多伊彻简述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理论背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俄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清除半封建遗产。只有完成这一阶段的革命

之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在俄国充分发展；只有完成资本主义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夺取政权。换言之，从“半封建”到社会主义之间，还有资本主义这一环，“这是西欧民主党人和俄国的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都公认的原理。后两者的争论集中在是哪个社会阶级，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问题上。”托洛茨基部分地赞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认为俄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应当由工人阶级来承担这个角色；但他更进一步发挥：由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能把俄国革命的剧变限定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应该（不停留在资本主义阶段）立刻“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孟什维克则认为，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俄国还“未成熟”，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工人阶级必须协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托洛茨基反对这种说法，他宣称：“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能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夺取政权。……俄国革命创造了条件，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有机会充分显示他们的政治才能之前，政权就应该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一旦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应马上在欧洲大地上将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他还说“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分析社会关系的方法，而不是教科书”。这就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早期思想（他终其一生，都在不断补充这种思想）。

### 第三部分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虚幻

#### 3. 流浪的革命岁月

1906年11月，托洛茨基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在押送流放地的途中，托洛茨基成功逃脱，随后亡命芬兰。在此后的岁月里，托洛茨基穿梭于伦敦、柏林、维也纳、苏黎世、巴黎等欧洲各个城市，成为流浪的革命家。他在柏林认识了被当时的革命者称为“欧洲社会主义的‘精神导师’、马克思主义的‘教皇’”的卡尔·考茨基，但托洛茨基却认为考茨基这位大师的思想相当平庸，使他感到失望；后来又认识了弗兰茨·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著名的德国革命家。“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一样，反对孟什维克的革命观，但又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希望看到俄国革命运动“欧洲化”。1912年初，列宁在布拉格宣布“布尔什维克派”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托洛茨基再次攻击列宁。此时的托洛茨基，在革命的十字街头似乎无所适从。多伊彻认为，从1907年至1914年，是托洛茨基政治生命史上无所作为的一章。1914-1916年，托洛茨基在巴黎逗留了两年，1916年9月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前往西班牙，于1917年1月到了美国。同年5月，托洛茨基经芬兰回到彼得格勒（此前一个月，列宁已回到俄国）。这时候的俄罗斯大地，风雷激荡，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刚刚过去不久，而另一场由无产阶级举义的震撼世界的革命即将爆发。就如托洛茨基所预见的，俄国“已经开辟了一个新

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但不再是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斗争的纪元，而是被压迫的受苦阶级反对统治者的斗争的新纪元”。托洛茨基与列宁这两位十数年来长期不和的革命领袖再度相逢，托洛茨基对列宁说，他已抛弃了旧日的立场，不再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了。列宁不计前嫌，欣然视托洛茨基为同志，总之，他们“已经弥合了”。不可否认，托洛茨基具有比其他俄国革命家更出色的政治才能，此时的布尔什维克正需要这样杰出的雄辩家、宣传家、鼓动家和策略家，于是列宁诚邀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列宁甚至赞扬托洛茨基，说自从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决裂以来，再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出色的布尔什维人了。此后，托洛茨基就成了列宁深为倚重的臂膀。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托洛茨基除了与列宁携手合作，已别无出路。

至此，托洛茨基充分发挥出其政治潜能，在革命运动中叱咤风云，“个人品格大放异彩”。他已经可以不把普列汉诺夫之流看在眼里了，其在革命群众中的威望，连列宁也稍逊一筹。卢那察尔斯基说：“在托洛茨基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的影响下，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下，不少接近托洛茨基的人都有认为他是俄国革命的头号领袖的倾向。”1917年7月，托洛茨基被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逮捕，很快就在9月获释。历史在等待着列宁和托洛茨基们发动改天换地的大变革。10月25日（俄历），阿芙诺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十月革命爆发，克伦斯基政府垮台。

### 第三部分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虚幻

#### 4. 权力斗争的失败者（1）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既要对付外敌，又要清除形形色色的反对派，苏俄进入内战和抵抗协约国武装干涉的艰难岁捷尔任斯基（1877-1926），“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人，残酷镇压党内外反对派。

月，同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当尘埃落定，俄罗斯大地已是满目疮痍。为了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殚精竭虑，宵衣旰食，已心力交瘁，然党内外仍充满不稳定因素。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在镇压了党外反对派之后，又在党内进行清洗。1921年，布尔什维克党员人数约73万，1923年减少到不足50万，两年间，约占当时党员总数三分之一的二十多万党员被划分为各类“异己分子”被清除了。通过一次大的“外科手术”，剪除了党内反对派和冒谏者，以及各种“机会主义分子”，俾内部的声音保持高度一致。列宁逝世前，党内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斯大林的权力欲表露无遗。”列宁

在他的晚年认为，斯大林是集权主义者、官僚主义的核心人物斯大林

或带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偏向的人。为了遏制斯大林，列宁在反斯大林的斗争中曾要求托洛茨基予以合作。”斯大林、季洛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同盟，“三驾马车”通往权力之路的障碍是托洛茨基。在他们眼中，托洛茨基是机会主义分子，迟早在清洗之列，只是碍于列宁还在世，且托洛茨基是革命元勋，位高权重，如日方中，列宁又对其寄予厚望，故不敢造次。但此时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列宁在日常工作中更多地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此，托洛茨基自有解释：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工作方式以及实行决定的手段。列宁充分了解并能够尊重我的这一特点。正因为如此，他十分清楚我不适于受人支配。……这样，在某些时期，尤其是在我和列宁发生分歧的时候，列宁的助手们就觉得他们与列宁的关系特别密切。……我认为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列宁需要的是听话、能够做具体工作的助手，而我不适合充当这样的角色。我为列宁没有让我去做他的副手而非常感激他。我绝不认为他这样做是不信任我，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他对我的性格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明确评价。

托洛茨基这番话是否别有衷情，且不去考究，但已暗示他与列宁之间常有分歧。在列宁时代的最后几年，斯大林已有觊觎最高权力的迹象，托洛茨基感觉到个人独裁的危险性，他把个人独裁视为“波拿巴主义”的最高体现。就如多伊彻所指出的，列宁逝世后，“个人独裁制变得更有侵略性更残暴……独裁制就其定义来说是矛盾的，布尔什维克中各派、各集团之内形成了某种类似于影子多党制的力量。个人独裁制的逻辑毋庸置疑地要求取消这些派别。斯大林成了这一逻辑的代言人。”托洛茨基一向瞧不起斯大林，在他眼里，斯大林“政治视野极其狭隘，理论素养低得可怜。在他那本叫做《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中，有大量的低级错误。……他是一个缺乏创造性想像力的顽固的经验主义者。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他充其量是一个二三流的角色。斯大林主义首先就是革命衰退阶段机械性的机构的产物”。但他又补充说：“斯大林是我们党内最出色的庸才。”托洛茨基未免太小看斯大林了，偏偏就是斯大林这个“二三流的政治角色”，后来把一流的政治理论家托洛茨基给撵走了。1923年10月，托洛茨基写信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出党内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全的制度”，要求用“党内民主”取代“书记处官僚主义”。46位老布尔什维克发表声明，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此即著名的《四十六人宣言》。这时候的俄共（布）中央，派系复杂，有所谓托洛茨基派、斯大林派、季诺维也夫派、加米涅夫派以及布哈林派等。托洛茨基派遭到斯大林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联盟（多数派）的强力反击。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托洛茨基是这样评价列宁的：

我把列宁同马克思作了比较。我很清楚列宁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其中充满了学生对老师的感激、爱戴和敬仰之情。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在历史的进程中成了理论先驱和第一个实践者之间的关系。……在历史的进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联系是那么的紧密，同时又是那么不同。对我而言，他们是人类巨大精神财富的两座高峰。……在列宁的眼中，马克思的尺度是衡量人的个性的最高尺度。

这样的评价，虽不中亦不远矣！托洛茨基又总结自己与列宁的关系：

### 第三部分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虚幻

#### 5. 权力斗争的失败者（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它造成了我与列宁持续几年的决裂。今天，再回顾我走过的道路，我并不因此而遗憾。我重新回到列宁身边比其他许多人要晚得多，但这确实是我在走过了自己的道路，积累了革命、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选择。与那些把列宁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都奉为圣旨的“信徒”们相比，我重返列宁身边的态度更加坚决和郑重。从 1902 年至 1923 年，这两点之间整整经历了两个十年的时间。最初是合作，然后是激烈的派别斗争，后来又是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的合作。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正题、反题、合题。……尽管我和列宁之间经历了漫长的反题时期，但列宁对我的态度仍然是“伦敦时期”的（指最初的友好合作——引者）；这意味着，他对我的态度是热情支持和充满友情的，但这已经是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了。

列宁去世后，俄共（布）中央各派系展开激烈的争夺最高权力的角逐，托洛茨基反对提升斯大林，两人的斗争白热化。托洛茨基既然充当了党内反对派的角色，就必定不为斯大林们所容，斯大林亲自制订了围剿托洛茨基的计划。1925 年 1 月，托洛茨基被解除了军事人民委员的重要职务，只给了他“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等几个闲职，使他逐渐远离权力圈。在当时俄共（布）中央的权力斗争中，“敌我关系”随时会发生变化。1926 年至 1927 年之间，季诺维也夫派与托洛茨基派结成同盟，与斯大林-布哈林联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被“斯-布联盟”击败。1927 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928 年 1 月，托洛茨基与妻子、儿子一起被流放到苏联中亚地区（未跟随流放的女儿被开除出党并解除工作，6 月在莫斯科病逝，年仅 26 岁）。流放中的托洛茨基不断与反对派保持联系，伺机东山再起。1928 年下半年，“斯-布联盟”分裂，从此开始了斯大林专权时代。斯大林执政后，实施了一

个史无前例的巨大计划，一举把2000万俄罗斯农民连人带财产赶进集体农庄。托洛茨基说，法国路易十四时代是“朕即国家”的时代，斯大林时代是一个“朕即社会”的时代。同年12月，托洛茨基给已被斯大林所把持的联共（布）[早在1925年12月，“俄共（布）”已改名为“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作为一个始终不渝的反对派的立场和态度：国家政治保卫局奉命作出决定，要求我停止所有政治活动。否则，将会改变我的生活条件，以使我完全脱离政治生活，甚至会考虑改变我的居住地点的问题（暗示流放出国——引者）。托洛茨基说：

斯大林执政后，强迫农民进入“集体农庄”。

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就意味着要求我停止为全世界无产者的利益而斗争。……对于那些企图把我的这些活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的人，我要在全世界无产者面前控诉他们践踏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控诉他们损害世界革命的利益、背叛十月革命的传统……的罪行。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停止为反对苏联现行领导的盲目性而斗争；……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放弃反对令人窒息的专权制度的斗争。……反对派尽管目前貌似弱小，但它的伟大的历史力量源于，它把握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脉搏……能够预见到明天并自觉地为它做准备。放弃政治活动，就意味着放弃为明天做准备。

列宁在“遗嘱”中所说的那个“粗暴而不忠诚”的斯大林，在当时还没有暴露出他今天这些品性的百分之一。如今，狭隘的斯大林集团又在策划对反对派进行更为残酷的镇压，它假借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名义给反对派罗织“通敌”的罪名。……他们使用暴力对那些忠于十月革命传统的优秀布尔什维克从肉体到精神进行摧残和折磨。……为了彻底灭绝反对派，斯大林打算以集中营来代替流放。……我早就预见到今天对我的“宣判”，但我绝不放弃为党和国际革命而奋斗；我们要把自己的使命进行到底。

对于托洛茨基的控诉，斯大林不屑一顾，下令彻底隔绝托洛茨基与外界的联系。此时的斯大林，已消灭了布哈林派、季洛维也夫派和托洛茨基反对派对自己的威胁，森然柄政。托洛茨基的厄运来临了。

1929年1月20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向托洛茨基下达“判决书”——

经审理查明：公民列夫·托洛茨基一案被定为反革命案件，该犯有组织反苏维埃非法政党的罪行。该非法组织的近期活动旨在挑起反苏行动，并策划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判决如下：将公民列夫·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国境。

当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要求托洛茨基在“判决书”上签字时，托洛茨基写道：“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我宣读了判决书，该判决在实质上是犯罪的，在形式上是非法的。”托洛茨基说：“我之所以把这一判决称为是犯罪的，是因为它说我在策划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这显然是一派谎言。斯大林需要以这种谎言为借口把我驱逐出国，而这本身就是对苏维埃政权根基的最恶毒的破坏。”

1929年2月10日深夜，斯大林将对他构成主要威胁的政敌托洛茨基（包括夫人和长子）驱逐出境。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捍卫的是纯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全部理性力量和道义力量，也包括它的全部政治上的弱点……斯大林驱逐了托洛茨基，也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驱逐出了俄国。”托洛茨基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次流亡，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俄罗斯永别。在被押解出境的途中，托洛茨基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写了一封信，强烈谴责斯大林及其同伙，然后义无反顾地踏上去国之路。”托洛茨基回首眺望渐渐远去的海岸，他一定会感觉到，似乎留在他身后的那整片国土都变成了冰雪的荒原，似乎革命本身都被冻僵了。”

### 第三部分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虚幻

#### 6. 在流亡中完成《不断革命…

1929年11月，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完成专著《“不断革命”论》。中译本“出版者说明”指出：自从托洛茨基在1905年正式提出“不断革命”论以后，“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等一系列问题上，他同列宁发生了严重分歧”。两人由分歧而产生的论战，一直持续到列宁逝世。

列宁与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充当什么角色这个问题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张，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的能力，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建立以工人阶级为先锋、以农民为同盟军的“工农民主专政”；但这场由无产阶级领导其他同盟者的“特殊形式”的革命，归根结底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托洛茨基则反对“联合专政”的观点，主张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雏形。不论是列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还是托洛茨基的观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假如还有“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之说）无疑是一种新奇的政治观（政权观），列宁与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殊途同

归，只是斯大林及其同盟者出于权力斗争的目的，夸大了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曾自述其“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1905年到1917年间，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革命观点，即不让无产阶级加入政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使其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而到了1924年秋，‘托洛茨基主义’又开始意味着这样一种观念：取得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一国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支撑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也许会比先进国家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却要比先进国家晚到达社会主义。”据《托洛茨基主义》一书所述：在十月革命前，“谁也没有想到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会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在俄国革命家中，预言落后国家俄国将首先进行革命的只有托洛茨基一人。而列宁甚至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还认为，欧洲会首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列宁是主张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论的”。“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这个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来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革命以来的基本理论就恰恰是主张‘不可能论’。托洛茨基曾经详细地援引文献来论证这一点。……列宁在世时根本没有提出过俄国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点实际上已由斯大林自己作了旁证。1924年4月，列宁去世后不久，斯大林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也从列宁的观点出发，论述了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布哈林也是如此，他也一直反对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早在1921年，包括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斯大林在内的党的政治局发表的《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纲领》中，明确指出“俄国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口占优势的落后国家，俄国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但在1924年12月，“斯大林在他写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却提出了与‘不可能论’背道而驰的‘可能论’……而主张‘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布哈林也随着斯大林主张的变化而改变了观点”；“斯大林改变主张的真正原因在于托洛茨基与‘三人帮’（指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引者）的权力之争”，斯大林为了清除托洛茨基，“居然到了要修正布尔什维克‘不断革命’这一传统的基本理论的地步”。而“布哈林是一位远比斯大林卓越的理论家。不过，我们只能认为，他最终还是由于权力斗争而追随斯大林，并因此而改弦更张”，“站到了反对托洛茨基的‘三人帮’一边”；“后来，他后悔于同斯大林的联合”。如此看来，列宁的“革命观”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并非完全不相容，《托洛茨基主义》的作者对马忠行甚至认为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对立，特别是在落后国家俄国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完全一致的”。与其说是列宁同托洛茨基有理论分歧，莫如说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由“不断革命论”引发激烈的权力冲突，而“不断革命”的争论只是他们之间权力

冲突的外衣，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生死搏斗已经远离理论层面。

《“不断革命”论》集中阐述了托洛茨基一贯的“革命思想”，这一思想在他的《总结与展望》（1906年）一文中也有所发义。总的来说，列宁与托洛茨基既有分歧又有共识，即或有争论也不是势不两立，他们是在分歧中逐渐走到一起，最后在十月革命的重要关头，行动达成一致。晚年的列宁是赞赏托洛茨基的理论才能、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的，否则他也不会“口述遗嘱”中对斯大林无限膨胀的权力深表忧虑，而对托洛茨基给予高度评价。

### 第三部分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虚幻

#### 7. 在流亡中完成《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的“俄文版序言”中说：“不断革命，从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说，意味着一种同阶级统治的任何形式都不妥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停留在民主主义阶段，而要进一步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并进行反对外国反动势力的战争；这就是说，这种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前一阶段相衔接，它只有在阶级社会完全消灭的时候才能够结束。”“不断革命”论不但关涉俄国革命，它还要表述的是社会变革过程的阶段性以及这一变革在世界范围的连续性、持续性，也就是如何在全世界连续地、不间断地进行革命。托洛茨基说，“不断革命”论不是他的发明，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了，但托洛茨基的确是“修正”了马恩“不断革命”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中说：“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在《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一文中提出了其“不断革命”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尽管俄国从历史上说是落后的，但是在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前，俄国无产阶级仍能通过革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二，在被资本主义敌对世界所包围着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种种矛盾，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范围内，才能找到摆脱这些矛盾的出路。”由此，托洛茨基版的“不断革命”论构想了三个“不断性”革命的递进关系：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的不断性。他从七个方面系统而繁琐地阐述了其“不断革命”的思想——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进行一次“跳跃”，而是在无

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族改造；“民主专政”的三个要素：阶级、任务和政治结构；不断革命论在实践中是怎样的；“民主专政”在俄国实现了吗？如果实现了，是在什么时候实现的；论“跳过历史阶段”；民主专政的口号对东方意味着什么；从马克思主义到和平主义。最后以十四个“基本论点”解释“什么是不断革命”。简言之，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落后国家一国范围内独立建成，即使暂时建成也会被强大的资本主义体系所孤立，必引起国内矛盾的激烈爆发，以致造成崩溃（苏联在后来的崩溃与它首先建成社会主义没有因果关系，并不能证明托洛茨基有先见之明——引者）；“一国的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尽管它有暂时的衰退和低潮”；后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完成，而是革命的开始”；“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像的”，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社会主义革命才算完成，所以，必须进行世界性的革命。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游谈无根，空疏浮泛而不切实际，无甚新意。托洛茨基的思想虽以“主义”之名大行其道，在世界上宗奉者众（是为“托派”），究竟不成气候。“不断革命”论所牵涉的理论问题和由此而引起的激烈争论错综复杂，还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冲突和革命领导权的归属，以及对世界各地革命力量的控制，势必引起党派之间的激烈斗争。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既有宿怨，“托洛茨基主义”便成为斯大林清除异己的口实，遭到沉重打击。1936年8月，流亡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完成了他一生中另一本名著《被出卖的革命》（有两个中译本，一是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12月编印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柴金如译，内部发行，“灰皮书”；一是台湾南方丛书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的《被背叛的革命》，简文宜译）。此书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论述了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社会的变化。在“苏联往何处去”一章中，托洛茨基认为自进入斯大林时代以后，列宁所提倡的民主制已被全能的官僚制所压倒。托洛茨基指出了斯大林主义的危害性，说“斯大林主义与希特勒主义虽然在社会基础上有很大的差异，却是两种互相对称的现象，两者之间有许多要点是极其相似的”；“苏联将看见自己已经置身于崩溃的悬崖之上”。1940年8月21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刺身亡（撰写中的《斯大林：对此人及其影响的评价》只完成七章。中译本易名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关于他的被杀，背景扑朔迷离，有人认为暗杀者是斯大林所派遣。托洛茨基一生执著于“不断革命”的乌托邦梦幻，历经沙俄政府的关押、流放和斯大林时代的流亡，至死不渝，固然悲壮；然则假设当年他在与斯大林的较量中取胜，也不过是以托原籍波兰的学者多伊彻著的托洛茨基政治传记《先知三部曲》洛茨基主义代替斯大林主义而已，其统治形式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变化，相信亦摆脱不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结局。

### 第三部分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虚幻

#### 8. 在流亡中完成《不断革命…

一直以来，东西方政治学者对托洛茨基其人以及他在国际共运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论）的评价分歧很大。多伊彻曾经是波兰共产党内的“托派”，他对托洛茨基及其学说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先知三部曲》这部一百二十多万字的传记体学术名著中。出于对“教主”的崇敬，作者在叙述中难免对托洛茨基有溢美之辞，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深度的研究托洛茨基的权威性著作。多伊彻是这样总结托洛茨基的一生的——

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丰富和辉煌，以至随便拿出它的一个片断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倘若他在 30 岁或 35 岁时即 1917 年前的某个时候死去，那么他就会跻身于别林斯基、赫尔岑及巴枯宁这样一些俄国思想家与革命家之列，作为堪与他们匹敌的马克思主义晚辈。倘若他的生命在 1921 年左右结束，大约与列宁同时，那么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托洛茨基就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和国内战争时期的总司令，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导师……向全世界的工人说话。他所主张的思想以及他作为 1923 年至 1929 年反对派领导人所完成的工作形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共产主义编年史中最重要、最悲壮一章的总结和实质。他是本世纪最大的一场意识形态论战中的主角，……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抵制斯大林主义抬头的那些人的喉舌。哪怕他未能活过 1927 年，他在身后也留下了一份思想遗产。这份遗产既不会被消灭也不会永久湮没；由于这份遗产，他的许多追随者高呼着他的名字慷慨就义；时间将赋予这份遗产愈来愈重要的意义……

这番话对托洛茨基确乎评价甚高，不论我们同意与否，亦姑妄听之罢。《“不断革命论”》台湾版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言论》（灰皮书）《“不断革命”论》另有一中译本，系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91 年出版，译者林骧华等。托洛茨基的重要著作，多已译成中文，除了《“不断革命”论》、《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及其《自传》（有多种全译、节译本），还有《俄国局势真相》（三联书店资料室 1963 年 12 月编印，刘珙译，内部发行）、《苏联的发展问题》（三联书店资料室 1965 年 11 月编印，内部发行）、《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三联书店资料室 1965 年 12 月编印，吴继淦等译，内部发行）、《托洛茨基言论》（上下册，三联书店 1979 年 7 月出版，郑异凡等译，内部发行）、《论列宁》（三联书店 1980 年 2 月出版，王家华等译，内部发行）、《肖像集》（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出版，南江等译，内部发行）、《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2 年

6月出版，刘文飞等译）等。国外研究“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也有不少译为中文，除了上述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先知三部曲》，举其要者有《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三联书店1964年4月出版，杨永等译，内部发行、《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苏]巴斯马诺夫著，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苗为振等译，内部发行）以及五辑《托派第四国际资料》（商务印书馆1963年11月-1965年2月陆续出版，内部发行）等。

#### 注释

①《武装的先知》，第93页。

②《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182页。

③转引自《俄国政党史》，第72-73页，李永全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④《武装的先知》，第87页。

⑤《武装的先知》，第118页。

⑥《武装的先知》，第98页。

⑦⑧《武装的先知》，第101页。

⑨⑩《武装的先知》，第102页。

《武装的先知》，第100页。

《列宁全集》，第8卷，第80页。

转引自《武装的先知》，第128页。

《武装的先知》，第154页。

《武装的先知》，第167页。

转引自《武装的先知》，第170-171页。

《武装的先知》，第200页。

《武装的先知》，第 2 0 2 页。

转引自《武装的先知》，第 2 8 2 页。

见《武装的先知》，第 2 8 8 页。

转引自《武装的先知》，第 2 9 9 页。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 4 4 5、4 4 6 页；[法] 夏尔·贝特兰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7 5 年 8 月出版，“灰皮书”，内部发行。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 2 0 页。

《托洛茨基主义》，第 2 页。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 5 4 5 页。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 5 0 0 页。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 5 8 0、5 8 8 页。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 1 8 3 页。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 5 8 5 页。

见《流亡的先知》，第 4 9 2-4 9 3 页。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 6 4 1-6 4 6 页。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 6 4 7 页。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 5 0 2 页。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 5 0 9 页。

转引自《托洛茨基主义》，第 2 3-2 4 页。

《托洛茨基主义》，第 3 1 页。

《托洛茨基主义》，第32、63页。

《托洛茨基主义》第9-13页。

《托洛茨基主义》，第20页。

《托洛茨基主义》，第6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2、299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1版。

转引自《托洛茨基主义》，第35-36页。

《“不断革命”论》，第88页。

《“不断革命”论》，第224页。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249、258页，简文宜译；台湾南方丛书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

《流亡的先知》，第553-554页。

#### 第四部分 赫鲁晓夫的“新纲领”

##### 1. 新纲领出台的时代背景（…

1961年10月17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80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都派出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各国外交使节、世界各大通讯社和各大报纸的记者也在邀请之列（这在苏共代表大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可谓盛极一时。在会议上，赫鲁晓夫赫鲁晓夫（1894—1971）。1953年至1964年任苏共第一书记；1958年至1964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被解职。

代表苏共中央作了《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的报告（以下称“新纲领”或“新党纲”），对这个“新纲领”，赫鲁晓夫称之为“现时代的共产党宣言”。他宣称，苏联已经没有阶级冲突，已经成为“全民民主国家”，接下来的任务是：苏联要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谁要想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那我们可以自豪地对他说：请读读我们党的新纲领吧。”（见《苏联和未来》，以下引文除另注，均出自此书）赫鲁晓夫把这个“新纲领”与《共产党宣言》相

提并论，除了想沾马克思恩格斯的光，为自己的政绩吹牛皮，还别有用意，他是想向西方表明，“世界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兄弟们亲密无间，“团结得像磐石一般”。其实在这个时候，共产主义阵营已经严重分裂，中苏关系更是紧张冲突。就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公开谴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与会者都知道，这是在向毛泽东和北京的“兄弟党”发冷箭。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反击：“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为了表示不满，周恩来未等会议结束就提前回了北京。接下来，“代表大会的后半场戏就变成各国共产党发言者决定他们站在哪一边毛泽东、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由左至右）的演出了。其中，大多数党都支持莫斯科”。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中两党的分歧日趋严重，论战一触即发。早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政策等问题上就开始出现分歧。1960年4月，中共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正式提出批判“修正主义”。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七篇文章，回答苏共及其兄弟党的攻击。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涉及一系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问题和中苏两党的分歧，建议双方“停止非同志式的论战”，举行会谈，“寻求巩固兄弟党友谊的途径”。6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阐明中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立场和观点，认为苏共的来信“完全颠倒是非”。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指责中共对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以来的决议和苏共的“新纲领”进行“诽谤性的攻击”，中共的行动是“不友好”的，“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至此，中苏两党冲突激化，已不可调和。为了反驳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九评”），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出版。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九篇评论文章（1965年3月，人民出版社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为书名结集出版，此即著名的“九评”），论题的内容相当广泛，如中苏两党的分歧、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否社会主义国家、新殖民主义、战争与和平问题、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是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分裂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及假共产主义等，涉及当时的国际形势、世界革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并对赫鲁晓夫政府的“新纲领”提出质疑，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大论战一直持续到1965年底，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九评”作为“战斗檄文”，其文风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判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

苏共领导人吹嘘，“新纲领”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层希望通过这个新纲领，消除斯大林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负面形象，营造一种新的政治气氛，指

明今后（至少二十年内）苏联要走的道路和前进的方向。“新纲领”对未来作了很多许诺和憧憬，但最重要的一点并没有忘记告诉人民，决定每个人的政治意向和物质需要的仍是党和国家，而不是每个人自己。因此，为了保证“新纲领”的切实执行，苏联党的统治要继续存在下去；它要求苏联人民认识并接受这种现实，不要幻想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方面，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政府承诺将赐给人民丰富的物质利益，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赫鲁晓夫承认斯大林主义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承认人民中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承认苏联在本质上是一个集权政体，但又画地为牢，承认现实而不彻底改变现实：既要批判斯大林主义，又不能矫枉过正，只能在“新纲领”的约束下亦步亦趋。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固然行之不远，但起码允许“修正”现实。

#### 第四部分 赫鲁晓夫的“新纲领”

##### 2. 新纲领出台的时代背景（…

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却不容许人民质疑这种社会现实，更不能对他的一言一行表示怀疑。斯大林为了牢固地驯服苏联人民，大搞个人崇拜。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亲自使用一切可以想像到的办法来助长对他的颂扬。”《斯大林政治传记》的作者（也是托洛茨基政治传记《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说：“多年以来，甚至表面上的‘集体领导’也没有限制住斯大林的专制，而对他的个人迷信甚至达到了难以想像的荒谬程度。他被说成是人民的父亲，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所有劳动人民的朋友和导师，人类的光辉太阳，给社会主义以生命的力量。诗歌和文章，报纸和书籍，公开的演讲和党的决议，文学评论和科学论文，所有口头上的和文字上的表达，都充满了这些崇拜的称号。其实比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几位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信徒，斯大林对人类的贡献实在是微不足道。如果说君主专制是靠上帝的恩赐来进行统治的话，斯大林就是靠历史的恩赐来进行统治的。他被尊为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国家以其骄傲的崇高地位，据认为是居于其余人类社会之上，但却拜倒在他的脚下。”<sup>①</sup>斯大林强迫苏联人民同意他所实行的个人独裁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制度，如果有人提出异议，就会被关进集中营，或者被当作阶级敌人枪毙。“斯大林最喜欢的‘政治’武器是一—让‘罪犯’自己坦白，准确地说是 在刑讯、杀戮和恐吓的影响之下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斯大林大肆镇压所谓反对派和他们的领袖人物，被镇压的人不是成百、成千，而是上百万。”（〔俄〕伊利扎罗夫：《斯大林：私人图书馆和档案中的人物特征》，载《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1938年，在斯大林的亲自主持下经过无数次修改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

了，整个党的宣传机构都参与了该书的编写工作。列宁时代的许多重要历史都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编写，准确地说，是篡改。这是一个“钦定本”，很多内容都“符合斯大林同志的意愿”。于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了对斯大林的“赞美诗”，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的元勋成了“阶级敌人”。“列宁最初提出的接班人是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的对手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他人尽力使斯大林厌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联合起来一起排挤了党内的‘异己’，由此经常说的就是所谓‘集体领导’。然而所有人都失算了，斯大林已把党和国家机构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逐渐地，他变成了‘朕即国家’。‘斯大林主义’是‘朕即国家’的‘创造者’。‘朕即国家’创建了这样一种政治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不仅仅是社会的基础机构从属于他，整个国家的物质、精神以及文化领域都从属于他个人的意志，国家或者党雷巴科夫的小说和国家机关（包括教会）完全沦为他的工具。不论他被称作什么，或领袖，或独裁者，或皇帝，或总书记，他都通过恐怖手段、阴谋加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堕落等所有可用的手段使别人完全臣服于他。达到这一切的个人不仅获得了对国家机器和资源的权力，而且还可以对国家的所有成员进行监控。他的权力是如此的不受限制，以致他不仅可以控制事情的发展，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社会意识中已经形成的一些东西，比如历史，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规划未来，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现实结果。”斯大林主义证明了可以在“朕即国家”的范围内对数以十亿计的人民进行严厉控制的可能性，“斯大林证明了一个远称不上是天才的个人的意志就可以使历史臣服于自己，他也证明了在社会工程学中无任何道德和美学标准的限制。所有这一切的总和就是斯大林主义。……在 1923-1924 年，短时间内党和政府机构都支持了斯大林，也就是当时列宁在‘遗嘱’中所说的：‘斯大林在成为总书记之后，掌握了无限权力。’斯大林对党的机构和其他社会阶层进行驯服和改造，使其成为从属于自己的机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贝利亚或赫鲁晓夫等人如同奴隶一般带着爱戴之情为斯大林效劳，而且毕生都对他充满恐惧。他们如同大多数人一样，是新时期的国王斯大林的奴隶；他们不仅是社会现实中的奴隶（斯大林在对付他们时毫不留情，而且随时可以置他们于死地），而且也是精神上的奴隶。……斯大林在所有方面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形式主义者，这种形式主义也波及到国家、政治和科学创造等方面，使得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边缘，饥荒连年。国家由此变成一个巨大的集中营，所有人，不论是‘自由的’还是在集中营的，都必须重复这种荒诞，直到对其不再相信。……形式主义一劳永逸地成为初级、中级和高级学校学生的呆板公式。党的会议是形式主义，组织的群众集会也是形式主义，法庭的诉讼程序是形式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是形式主义。甚至连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由他空想出的世界中度过的，也就是在由他所创造的一个平淡乏味又充满恐惧的世界中度过的。在这个世界中自始至终真正地完全自由地活着的就只有

它的创造者，他就是斯大林。”（《斯大林：私人图书馆和档案中的人物特征》）

#### 第四部分 赫鲁晓夫的“新纲领”

##### 3. 新纲领出台的时代背景（…

在苏共二十二大闭幕的当天（1961年10月31日），大会作出一个重大决议：将斯大林的灵柩从红场的列宁陵墓中迁出，另外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随后，苏联各地陆续拆毁斯大林纪念碑和纪念像，矗立在伏尔加河-顿河畔的巨型斯大林铜像也被送进熔化炉。赫鲁晓夫试图通过物质上的“去斯大林化”，以消除斯大林的痕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主义不但没有在赫鲁晓夫时代被彻底“化掉”，而且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卷土重来。

苏共二十二大的关键是“新纲领”，“新纲领”的公布，引起了西方政治学者的极大关注。1963年，美国普莱格出版社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了《苏联和未来——对苏联共产党新纲领的分析》一书。这是一部政治论文集，由十多位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包括几位流寓西方的苏联学者）共同撰写，论题广泛而深入——意识形态方面：苏共通过新党章的前前后后，新纲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苏联的创作自由问题。国际方面：和平共处和革命，民族主义和民族，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经济方面：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和工资，苏联农业和苏共纲领。政治方面：新纲领中的党和国家，苏联的国家是否在消亡。其他方面：教育和新纲领，苏联武装部队和新纲领，苏共新纲领是否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南针，等等。本书主编伦纳德·夏皮罗（伦敦大学政治学讲师，著有《独裁政治的起源》、《苏联共产党》等书）写了一篇题为《从乌托邦到现实主义》的引言，分析了“新纲领”所产生的理论背景，指出“新纲领”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思维，但已经开始抛弃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正视现实总比生活在一个幻影中的世界要好”。在主观上，赫鲁晓夫为了撇清自己与斯大林专制统治的关系，在1956年作了清算斯大林主义的“秘密报告”，后来又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陵墓，但他始终没有勇气毅然切断一直遗留在他身上莫洛托夫，强硬的反改革派代表人物。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脐带。就如伊萨克·多伊彻所说：“斯大林的尸体已经从这个圣殿中撤出，他的名字已被抹去，但那些被斯大林的阴影缠身、并为他的政治遗产感到不知所措的后代子孙们，仍然无力摆脱和超越他，只能暂时地把他从记忆中忘掉。”②在客观上，苏共元老中的既得利益势力也不会坐视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走得太远。斯大林死后，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强硬的反改革派对赫鲁晓夫的政治改革确实起到很大的掣肘作用，他们认为斯大林的统治方法仍然有许多可取之处，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斯大林所实行的那种恐

怖手段同他的继承者的改革措施比起来，是一种安全得多的治国术”。莫洛托夫们想继承斯大林的政治逻辑：任何被怀疑对现行制度构成威胁的人和思想，都不容许有生存的空间，必须以国家的名义将其消灭殆尽，俾统治地位固若金汤。而赫鲁晓夫的思路是：在保持原来的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允许适可而止的批评，进行有限度的改革。一方面，莫洛托夫等人反对改革，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的“跛脚改革”又陷入困境。夏皮罗没有对赫鲁晓夫时代的改革作出直接的评判和预测，只是引用了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一段论述——

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并非总是因为人民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常见的情形是这样的：人民最初对暴虐的统治保持沉默，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这种统治的不合理之处；但当暴虐统治的压力一旦减少的时候，他们就会猛力推翻这种统治。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之前的政府制度有所改善。经验表明，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在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到来的。一个毅然担负起安抚自己的长久遭受压迫的子民的君王，要想保存自己的地位，非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不可。人民起初耐心忍受一些邪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他们觉得有可能消除这些邪恶，邪恶就会变得是不可容忍的了。

当苏共二十二大“新纲领”颁布的时候，苏联已经处于它的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赫鲁晓夫的政策引起的问题正在变得尖锐起来”，在所有的中，制度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制度是严厉的，不让批评者讲话；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所犯的“严重错误”，指出个人迷信是一种政治上的邪恶，导致国家和人民遭受沉重的灾难。为了换取人民的支持，赫鲁晓夫不得不许下改革的诺言，表示同斯大林主义划清界线，并为苏联的发展制订了“美丽的蓝图”；但赫鲁晓夫的改革将朝什么方向发展，会遇到多大的阻力，苏联的未来是何等模样，都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 第四部分 赫鲁晓夫的“新纲领”

##### 4. 列宁时代的党纲和列宁之…

在《苏联和未来》一书中，《通过新党纲的前前后后》一文（作者沃尔夫甘·伦哈德是德国人，曾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生活、工作了十年，著有《今日的苏联意识形态》等书）介绍了苏共二十二大“新党纲”产生的历史背景。

苏共二十二大的“新党纲”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替换了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亲自主持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党纲。1918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草拟一个新党纲，授权列宁、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七人组成纲领委

员会来进行这项工作。1919年3月，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和布哈林分别作了关于党的纲领草案的报告。经过激烈的争论并进行修订以后，这个党的纲领草案获得大会的一致通过。党纲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以计划经济代替自由贸易，消灭货币，准备“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彼时的俄国，正陷于内战的泥淖之中，各种政治势力在进行激烈的角斗，苏维埃政权如何收拾旧山河，重建国家，可谓步履维艰；眼前的困境（反对派的进攻、工农业瘫痪、全国性的大饥荒）尚未摆脱，就构筑未来的“美丽新世界”，实在是过于盲目空想。“1919年的纲领清楚地揭示了列宁和他的同事们的目标和希望。它乐观地宣布‘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了’。布哈林的著作《共产主义ABC》

纲领解释说，由于内战的缘故，‘作出剥夺政治权利的措施和各种各样限制自由的措施是必要的，但只能是暂时性的’，‘党将争取减少和完全取消这些措施’。纲领认为，领导国民经济的工作主要由工会来做，但没有提到集体化。”在法律上，列宁等党的领导人甚至设想在将来“根本改变惩罚的性质，应用公众谴责作为一种惩罚，用教育机构来代替监狱”。1919年的布尔什维克党纲随即被译成世界上的各种主要文字，布哈林（1938年被斯大林枪毙）的名著《共产主义ABC》就是评论这个党纲的。

由列宁亲自主持和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党纲领所预测的世界范围的革命并没有发生，而列宁就在1924年1月21日病逝。在列宁逝世前几天（1月16-18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讨论了列宁关于必须撤销斯大林党总书记职务的“遗嘱”。列宁逝世以后，苏联的政局波谲云诡，党的领导核心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值此关键时刻，托洛茨基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叙述了他与列宁的友谊和分歧，后汇集成《论列宁》一书出版；又将自己早年的文章和讲话汇编成文集《一九一七》，于同年秋天出版，并特意写了一篇题为《十月的教训》的序言。该文主要阐述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涉及布尔什维克党内领袖围绕革命策略问题所产生的分歧和争论。托洛茨基在这个时候发表《十月的教训》，是相当不智的，给了当时的俄共（布）中央主要领导人（以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攻击的口实，他们亲自挂帅，口诛笔伐，全面围剿托洛茨基，并立即在全国发动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猛烈批判。斯大林趁此机会拉帮结派，大肆打击异己，对严重威胁其地位的托洛茨基进行彻底的政治清算，欲去之而后快。托洛茨基以一人之力，哪里是斯大林们的敌手，终于败下阵来，被解除了在苏维埃中央的重要职务，暂时退出政治斗争舞台。不久，“三驾马车”分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另结成“新反对派”。1925年12月下旬，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将俄共（布）更名为“全联盟共产党”，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的“十九大”又将联共（布）更名为苏

联共产党，简称“苏共”]。这次会议首次出现“集体农庄”一词，此乃斯大林时代无情压榨农民的标志。在“十四大”期间，政治斗争相当激烈，“新反对派”提出加强党内民主和改组党的领导机构的问题，实质是要与斯大林争夺领导权。“新反对派”也斗不过斯大林，他们重蹈托洛茨基的覆辙，败下阵来。季诺维也夫因组织“新反对派”，被撤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和列宁格勒省委书记的职务，分别由布哈林和基洛夫顶替。斯大林虽然在理论上毫无建树（他与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杰出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相比，根本不入流），但于权力斗争之术却颇有韬略；他对付政治对手每每采取先结盟后清除的策略，各个击破，屡试不爽。“十四大”以后，斯大林日渐坐大，专权治党，篡改列宁领导下的苏俄革命历史。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③中指出，“整个人类历史上找不出与斯大林组织起来的规模庞大的谎言制造机器相似的事物，这个谎言机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斯大林制造一部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记……那些伪造出来的‘事实’，就是斯大林本人提供的”；“斯大林的专政制度笼罩着全党，换言之，在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下，党已经不成其为党了”；“斯大林不是靠他的个人品质，而是靠无个性的机器帮忙才掌握权柄的。不是他制造了机器，而是机器制造了他”。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机器”之喻，意味深长。斯大林不仅从组织上，而且正在有步骤、有系统地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的对手。为了抗衡独揽大权的斯大林，为了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政治地位，也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抛弃前嫌，结成“托季联盟”，共同向斯大林宣战。托季联盟提出的政治口号是：“回到列宁去！”“斯大林派正在欺骗工人阶级！”“制止斯大林分子胡作非为！”1926年7月，托季联盟发表《十三人声明》，署名者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等。“声明”指出，党的高层已明显脱离列宁主义路线，斯大林个人专权日益严重，要求斯大林履行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托季联盟未免太天真了，此时此刻，竟然还幻想斯大林会交出权力。独裁权力系统已经稳固形成的斯大林，立刻组织全面反攻，托季联盟最终被彻底击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一大批反对派被开除出党，遭到残酷打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自己的命运早有不祥之感，季诺维也夫（1936年被斯大林处决）。

#### 第四部分 赫鲁晓夫的“新纲领”

##### 5. 列宁时代的党纲和列宁之…

他们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突然死去，那就是斯大林干的。”果然，在大清洗初期的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下令处决（时为1936年8月25日）。季诺维也夫本是一个冷酷无情之人，在斯大林攫取实权之前，他是镇压反对派最心狠

手辣的刽子手之一（另一人是特务机构“契卡”的头目捷尔任斯基），谁料到他最后也成为“反对派”，被斯大林所镇压。托洛茨基在1928年1月被流放到中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他在国外继续致力于与斯大林的斗争。斯大林永远是一个进攻者，绝对不会容忍政敌的存在，当他认为某个政敌太过碍事的时候，就会采取“非常手段”，即使托洛茨基流亡在墨西哥，斯大林也不遗余力，将其除掉。1940年8月，“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死于斯大林下令的暗杀（2007年5月16日《参考消息》刊载了一篇译自西班牙《世界报》的文章《谁杀死了托洛茨基》，列举了确凿事实证明“是斯大林策划了暗杀托洛茨基的行动”；而且真正的凶手拉蒙在1978年死后，其骨灰埋葬在苏联的“英雄公墓”）。

列宁主持制定党纲的时候，鉴于社会动荡，国家不靖，作出了“限制政治权利和各种自由的暂时性措施”，并明确指出这只是权宜之计，在政局稳定之后要“减少和完全取消这些措施”。斯大林掌权后，一切以自己的旨意为党的纲领，朕即是党，党即是朕。他利用了非常时期的“暂时性措施”，把它作为镇压异己的有力武器。到了1936年至1938年大清洗的高潮时期，党内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前所未有的，个人崇拜助长了集权体制，而集权体制又产生了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互为因果。“苏联愈来愈朝着同1919年党的纲领中规定的目标相反的方向发展”，列宁时代的党纲成为一纸具文，被斯大林弃如敝屣，在党的文件中，在图书馆和书店中，再也找不到它的踪影；“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在苏联执行了许多年的党的纲领尽管仍然有效，实际上却被检查机关禁止了”。在1939年3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授意制定一个新党纲，以取代列宁时代的党纲，为此组成了一个由斯大林亲自担任主席、有25名党的高级领导人参加的“纲领委员会”（其中的著名人物有卡冈诺维奇、贝利亚、日丹诺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加里宁和米高扬等）。卡冈诺维奇（政治局委员，当时党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在党内的地位一度仅次于斯大林）所说的一句话，实际上道出了斯大林修改党纲的真实意图：“列宁又怎样！我马林科夫（1902—1988），苏联领导人之一。1953年至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被解职。

卡冈诺维奇（1893—1991），苏联领导人之一。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2年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委员。1957年被解职。他们所有的人都在说列宁、列宁主义，应当用一个新的概念——斯大林主义来取代列宁主义。”但令人费解的是，折腾了十多年，斯大林版本的“新党纲”始终没有出笼。到了1952年10月联共（布）“十九大”召开时，修改党纲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重新组织了一个“纲领委员会”，仍由斯大林担任主席。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日丹诺夫和加里宁已去世，卡冈诺维奇、贝利亚、莫洛托

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等再次被任命为“纲领委员会”成员，惟独赫鲁晓夫被斯大林摒弃在外。作为纲领委员会的发言人，卡冈诺维奇宣布，经过修改的党纲将“体现我们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贡献的一切新东西”。越明年，斯大林突然逝世，修改“新党纲”之事不了了之。斯大林死后，苏联政坛风云突变，经过一番权力生死搏斗，特务头子贝利亚被枪毙，赫鲁晓夫战胜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等保守派，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从此进入赫鲁晓夫时代。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开全面清算斯大林的序幕；随后，“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并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激烈争论和波兰、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其中“匈牙利事件”遭到苏联军队的武装镇压）。

在苏共“二十大”上，再次通过了关于草拟党的“新纲领”的决议，“指示中央委员会及时公布党纲草案，以便在第二十一大党代表大会以前广泛加以讨论”。由于当时苏共权力核心的斗争仍然相当激烈，领导机构的关系不明朗，故没有成立纲领委员会。1959年1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并没有提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开“非斯大林化”的序幕。

#### 第四部分 赫鲁晓夫的“新纲领”

##### 6. 列宁时代的党纲和列宁之…

交预期要公布的“新纲领”草案。1961年10月，赫鲁晓夫终于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了《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的报告，提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观点，踌躇满志地宣称国家准备“进入共产主义轨道”。这样豪情万丈的话，其实斯大林早就想说。斯大林在其权倾一时的“党天下”统治期间，一直想制订一个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全面体现他的“伟大贡献和英明思想”的“新党纲”，念兹在兹，却不能如愿。晚年的斯大林不容许赫鲁晓夫染指党纲的修订工作，怎料斯大林死后，修改党纲的“光荣任务”偏偏由被他鄙视的赫鲁晓夫来完成。就这样，列宁时代的党纲终于在赫鲁晓夫时代“正式地被替换了”。

赫鲁晓夫的“两全”理论，仍然未赫鲁晓夫时代重新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灰皮书”）能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瞻望前景，“美妙新世界”并非赫鲁晓夫们想像的那么美妙，一方面，苏联与西方世界冷战正酣，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经历着分化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有理由认为，在今后的年代里，新党纲将使苏联领袖们遇到许多头痛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之后，“苏联共产党在亚洲和非洲的领导地位面临中国的挑战，中国已亮出它自己牌号的革命理论公开同苏联竞争”；而苏共的“新纲领”与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描绘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相去甚远，苏联（及其“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未来充满变数。西方世界则静观其变，等待着这个外强中干的对手有朝一日会从乌托邦走向现实主义。

#### 注释

①《斯大林政治传记》，第694页；[英]艾萨克·多依彻著，于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

②同上书，第718页。

③《斯大林评传》，托洛茨基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 第五部分 斯大林女儿流亡记

#### 1. 破碎的家庭（1）

从斯大林逝世之后到苏联解体前，“斯大林主义”成为国际共运史和苏共史研究方面的显学。无论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是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都出版了很多有关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著作，这些著作大多侧重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造成的危害，每有真知灼见；然囿于缺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则较少涉及斯大林的家庭生活细节。1967年4月，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流亡美国，先后出版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和《仅仅一年》两本回忆录性质的书。由于斯维特兰娜的特殊身份，两书中所披露的大量斯大林家族的“秘闻秘事”，在冷战时代的东西方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笔者参以十多本从不同立场写的斯大林传记和有关研究著作，与斯维特兰娜的叙述互证，可以认为，她笔下的“斯大林家族史”是基本真实的。

在斯大林一生中，有两次正式的婚姻，两次婚姻共生下三个子女。十月革命前，斯大林跟随列宁反抗沙皇的独裁统治，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多次遭到逮捕和流放，几乎每次都从流放地成功逃跑。斯大林第一次结婚约在1903-1904年之间，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从斯大林原姓）出生于1908年（一说1907年）。1910年，斯大林再度被捕和流放，年轻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在同年病逝，遗下年幼的儿子雅科夫，由他的

姨妈和舅妈拉扯大。十月革命后，雅科夫回到斯大林身边，亲子归来，为父者本应喜悦，但斯大林却没有表现出一个父亲的舐犊之情，对雅科夫非常冷淡，于是照顾雅科夫的责任落在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娜佳·阿利卢耶娃（以下称娜佳）身上。虽然娜佳只比雅科夫年长7岁，但对他悉心照顾，视同己出；雅科夫也很敬重这位善良的继母。雅科夫性格内向，温和、沉静而略带抑郁，虽然从小缺少父母之爱，但很尊重父亲。他读大学期间，与一位神甫的女儿卓娅谈恋爱，当他们打算结婚时，遭到排斥宗教的斯大林的反对，雅科夫被迫在爱情和亲情之间作出痛苦的抉择。父命不可违抗，又难舍热恋中的女友，雅科夫深感绝望，在家中开枪自杀，幸好只是受了轻伤。事后，斯大林还嘲讽儿子的枪法，竟然对他说：“哈哈，没打准！”①雅科夫后来还是坚决地和卓娅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不幸女儿夭折，而以自杀行为换取的婚姻也失败了，令人唏嘘。1936年，雅科夫再次结婚，斯大林对儿子娶了一个犹太人为妻极不满意（斯大林对犹太人从来没有好感）。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33岁的雅科夫和伏龙芝炮兵学院的同学们一起上了前线，他担任炮兵连长，在战斗中表现勇敢。7月，雅科夫所在的部队陷入重围，他被德军俘虏，关押在萨克森豪森战俘营。希特勒俘虏了雅科夫，如获至宝，他企图用心理战瓦解苏联人民的抵抗，派出飞机在苏联领土上空投下伪造的雅科夫致父亲的公开信和印有雅科夫相片的传单，大意是德军势不可挡，斯大林的儿子都投降了，苏军应效法他缴械投降。据说希特勒当时曾想以斯大林的儿子与苏联交换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的德军元帅鲍卢斯（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的制订者之一），但遭到斯大林断然拒绝，斯大林说，战争就是战争，我不拿元帅换士兵。②斯大林放弃了救出儿子的机会，等于给雅科夫判了死刑。有外国记者想向斯大林证实他的儿子是否被关押在德国的战俘营，斯大林不承认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回答说：“希特勒的俘虏营里没有俄国俘虏，只有俄国叛徒，战争结束后我们就要收拾他们。”③斯大林下令，凡是被德军俘虏的红军官兵一律定性为叛徒。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果然将幸存返国的红军战俘用闷罐子列车押送到西伯利亚，让他们和政治犯一起在那里服苦役，罪名是苟且保存了性命。④斯大林只给他的士兵两条出路，或是战斗到胜利，或是死亡，被敌人俘虏在他看来是莫大的耻辱，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也罪不可恕。雅科夫被俘后，他的妻子尤利娅经受了一场无妄之灾，斯大林怀疑儿媳泄露了雅科夫的行踪，致使他被德军俘虏，竟把她投进监狱（时在1941年秋天）；两年之后，斯大林查清雅科夫的被俘与尤利娅没有任何关系，才把她释放出来。⑤据雅科夫在战俘营的难友后来的证词，雅科夫被俘后并没有辱没他的军人身份，更没有辱没苏联和斯大林。当雅科夫从广播中听到父亲冷血的“战俘论”，悲愤欲绝，他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决心为国死节。1945年4月14日，已过了四年屈辱的俘虏生活的雅科夫扑向集中营围墙带电的铁丝网上自尽（一说被德国士兵开枪打死）。战后，苏联拍摄了一部著名的“史诗电影”《攻

克柏林》，为了歌颂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伟大形象和“无私奉献精神”，导演曾想把雅科夫塑造成战争中的悲剧英雄，但斯大林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始终认为，雅科夫当了俘虏给他丢脸。1945年，驻德苏军发现了雅科夫的埋葬地，打电报向斯大林报告，他竟置之不理。

⑥

## 第五部分 斯大林女儿流亡记

### 2. 破碎的家庭（2）

斯大林和他的第二位妻子娜佳·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第二次结婚是在1919年春天，那年他39岁，妻子娜佳·阿利卢耶娃18岁（生于1901年），两人育有一子一女（瓦西里和斯维特兰娜）。儿子瓦西里·斯大林生于1921年，他不但继承了父亲显赫的姓氏，还遗传了斯大林偏执、傲慢、粗暴和骄横跋扈的性格。这位“红色王子”长大后被斯大林送去当空军，也参加过卫国战争，并多次立功；1946年，斯大林亲自签署命令，提升瓦西里为少将。在父亲的光环下，27岁的瓦西里在1948年当了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1949年，斯大林又亲自授予瓦西里空军中将军衔。⑦瓦西里一旦大权在握，便动用空军经费修建了一个占地55公顷的狩猎场和三座别墅。他生活奢侈，挥金如土，性好酗酒，经常呼朋引类在别墅里狂欢，饮得一塌糊涂；又是有名的登徒子，风流韵事层出不穷，而且专找战友和朋友漂亮的妻子下手，只要是他看中的女人，绝不放过。1953年斯大林死后，瓦西里马上被捕，罪名是“长期大量侵吞国家财产”。军事委员会判处他11年狱中监禁，实际上只坐了7年牢，于1960年被流放到喀山；1961年，因病提前释放，已是妻离子散；1962年死于酒精中毒，年仅41岁。斯维特兰娜分析，她的亲哥哥瓦西里是斯大林时代“政治环境、制度和这种政权的‘产物’和牺牲品，这一国家机器产生、培育并向人们的头脑灌输个人崇拜的思想。那些阿谀奉承、巧言令色之徒为了讨好斯大林，不惜制造机会令瓦西里飞黄腾达，把他提拔到很高的位置，而根本不考虑其是否有能力，只想如何去博取斯大林的欢心。贝利亚、布尔加宁们像玩傀儡斯大林与次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兰娜娜佳·阿利卢耶娃和女儿斯维特兰娜一样操纵着瓦西里，利用瓦西里拉近他们与斯大林的距离，给他军衔、勋章、金钱、汽车、骏马和美女，把他往坏处带，纵容他腐化堕落。斯大林一死，瓦西里马上失去利用价值，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们就把他摆上祭台了”。⑧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生于1926年，从母姓。斯维特兰娜只在母亲身边度过六年多的童年岁月，母亲就自杀了。斯大林从来不向女儿提及她的母亲，斯维特兰娜长大后，从母亲的亲人和朋友那里听到很多关于她的事情，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和《仅

仅一年》两书中，斯维特兰娜都叙述了她母亲悲剧性的一生。

娜佳多才多艺，擅长演奏钢琴，也经常参加戏剧演出。她曾亲自导演俄国著名剧作家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剧《大雷雨》，并担任女主角。但斯大林认为此剧“不合时宜”，不准她演出。娜佳对女儿悉心培育，教她画画、学乐谱、弹钢琴，还教她学德语（娜佳的母亲是德国移民的后裔）。娜佳聪明、美丽、善良，内向而坚强，对人彬彬有礼，不像斯大林那样粗鲁。斯维特兰娜认为，母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把斯大林目为革命英雄。她当时还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爱上了父亲的朋友、流放者斯大林，崇敬他才嫁给他。娜佳以极大的热情参加革命，并坚信这场革命将会给苦难的俄罗斯人民带来富裕和幸福。娜佳曾在列宁的私人秘书处任职，列宁“十分欣赏她充沛的精力、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对事业无私的奉献精神”。<sup>⑨</sup>1921年内战期间，红军在罗斯托夫地区的一次血腥屠杀令娜佳大为震惊，她给列宁谈了自己痛苦的感受，列宁同情地对她说：发生这些事情确实令人震惊，但也是“必要的”。<sup>⑩</sup>这件事一直让娜佳耿耿于怀，列宁逝世后，娜佳常在斯大林面前重提此事，却每每引起斯大林的反感，因为“必要的恶”在斯大林看来非但“必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斯维特兰娜对母亲充满崇敬之情，说她“对革命的态度充满了诗人般的浪漫主义色彩。她相信，人在首先改善自身之后，才会建立一个美好的未来”。从一件事可以看出娜佳对权力有着独特见解：大约在列宁逝世前后，俄共（布）中央通过一项决议，规定中央委员为党写文章和出版书籍时，一律要将稿费交给党从事公益事业。在革命的非常时期采取这样的特殊措施，应该说未尝不可。但娜佳对这项规定有不同意见。她认为，当时苏联高官的家庭开销由公家包起的制度弊端多多，容易滋生腐败；党的领导人将稿酬补贴家庭的日常生活，比无休无尽、毫无限制地伸手向公家索取钱财，用于私人的家庭、别墅、汽车、雇用仆人要好得多。儿子瓦西里出生之后，斯大林一家搬进了克里姆林宫居住，但娜佳不习惯过这种与人民大众疏离的“宫廷生活”，而斯大林从此以后就逐渐脱离现实，离群索居，“克里姆林宫的高墙是挡在党的领导人和苏联人民中间的一堵不可逾越的屏障”。住进克里姆林宫不久，娜佳与斯大林的关系开始破裂，发展到后来，更是在思想上与斯大林发生冲突。娜佳对斯大林感到失望，而且从他身上看到恐怖。她的丈夫，她曾经崇拜的英雄，逐渐变成粗暴偏执的统治者，变成凶残的魔鬼；他不但背叛了许多早年的革命战友，也瞧不起自己的妻子，“她的过去的理想破灭了，随之而来的是痛苦和失望”。目睹斯大林滥杀无辜，娜佳抗议、谴责丈夫，极力规劝，却无法令其稍悔。作为斯大林的夫人，娜佳有着“显赫的地位”，但这个地位使她感到压抑；她想摆脱斯大林，在斯维特兰娜出生不久，娜佳曾一度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但不久又回到斯大林身边。

## 第五部分 斯大林女儿流亡记

### 3. 破碎的家庭（3）

为了摆脱克里姆林宫沉闷的生活，1929年，娜佳用了一个假名到苏联工业学院读书。据苏联原内务部长奥洛夫回忆：“娜佳有机会走到人民中间，了解到许多她以前不知道的实情，并为严重的社会现实所震惊：工人的妻子和孩子经常食不果腹；成千上万个苏联姑娘为生活所迫而卖淫，以养活自己和父母；在农村，集体化运动造成很多农民死亡，或因抗拒而遭到流放；乌克兰发生饥荒，成群结队的孤儿沿街乞讨，在重灾区已经发生吃人肉的现象。娜佳在学校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强烈批评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回到家里又把她所了解的情况向斯大林汇报，希望他重视并进行干预，谁知斯大林用极其肮脏的语言破口大骂，不准妻子再上学，还下令逮捕了向娜佳讲述家乡情况的两个乌克兰学生。”

斯维特兰娜的姨妈曾对她说，她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殉难者”，“她在后期是不幸、幻灭和抑郁的”。据斯大林的一位警卫员回忆，娜佳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非常激动地对着斯大林大喊道：“你是一个暴君！你折磨自己的儿子（指他的大儿子雅科夫），折磨自己的妻子，你折磨全体苏联人民！”娜佳终于不堪忍受斯大林的专横暴戾，在1932年11月9日绝望自杀，死时才31岁（其中跟斯大林生活了13年）。但苏联官方的报道却说，娜佳·阿利卢耶娃死于急性阑尾炎引起的腹膜炎。斯大林对妻子的自杀感到震惊和气愤，认为是对自己的背叛。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斯大林走近棺木看了一下，突然用双手推开棺木，掉头就走了；他拒绝参加妻子的葬礼，一次也没有去看过她的墓地。妻子死后，斯大林立即搬离曾和妻子同住过的那套房间，他不敢再睡在那里，那个响过致命枪声的房间是他的梦魇。斯大林在孔策沃为自己建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别墅，此后二十年，斯大林基本上是独自一人住在那里，直到去世。斯维特兰娜分析：“妈妈的死对父亲来说是可怕的打击，使他的心灵变得如此空虚，他失去了对人、对朋友的信任。他一向认为妈妈是他最亲密最忠实的朋友，所以把她的自杀看作对他的背叛，在背后给他一击，于是变得更加冷酷无情。正是在这个时候，奸狡的贝利亚看出父亲的冷酷无情难掩心灵空虚，他抓紧机会向父亲靠近，并很快取得父亲的宠信；基洛夫被谋杀后，贝利亚就青云直上。贝利亚这个特务头子是一个可怕的恶魔，对父亲的影响相当大，在大清洗期间成千上万无辜者死于非命，父亲与贝利亚负有共同罪责。……据说妈妈在死前给父亲留了一封遗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封政治性的信件，充满谴责和控诉。这封信当时只有最亲近的几个人才得以读到，后来就被销毁了。”斯维特兰娜的姨妈和舅妈就是因为“知道得太多又说得太太多”，被斯大林关进监狱，坐了十年牢。斯维特兰娜认为，如果母亲不自杀，早晚也会成为斯大林的敌人。在斯大林后来所杀的老一辈革命功臣

中，有不少是斯大林和娜佳的共同朋友，如布哈林等；如果娜佳看到她最好的朋友死于自己丈夫之手，她是绝对不会沉默，更不会容忍的。

《出逃的斯大林女儿》一书记述了斯大林的一件“轶事”：斯大林丧妻不久，又迷上了年轻貌美、精力旺盛的罗莎·卡冈诺维奇。其实，在娜佳还未自杀之前，斯大林就已经认识罗莎。苏联的一些历史学家后来推测，娜佳不幸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斯大林对罗莎发生兴趣。罗莎个性很强，与斯大林只是一种“暧昧关系”，她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私人生活。一些材料认为，罗莎是苏共元老、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死后被赫鲁晓夫免职）的妹妹，又有人认为罗莎是卡冈诺维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收养的“侄女”。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极端反犹的斯大林却爱上了罗莎这位犹太人，“斯大林与罗莎的关系，反映了斯大林对犹太人所持的矛盾心理。斯大林早期的文章中曾抨击沙俄对格鲁吉亚人、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但犹太人的优秀素质又令斯大林嫉妒和仇视。由于变态心理和恐惧症的驱使，斯大林日丹诺夫在晚年形成了强烈的反犹思想（所以坚决不赞成儿女与犹太人结婚）。在斯大林的影响下，有许多苏联犹太人遭到整肃清洗，轻则被指控与‘犹太复国主义’有联系，重则诬以‘背叛’罪。例如，‘医生谋杀案’就是冲着犹太人来的”。

所谓“医生谋杀案”又称“医生间谍案”，是苏联国家全部捏造的冤案。1948年8月28日，苏联第二号人物日丹诺夫（斯维特兰娜第二任丈夫的父亲）病危，参加会诊的克里姆林宫医院女医生季马舒克诊断为心肌梗塞，而日丹诺夫的保健医生则认为是由高血压等病症所引起。国家保健局指示按后者的诊断进行抢救。第二天，日丹诺夫病情恶化。保健局长叶戈罗夫让季马舒克改写病历，贝利亚（1899—1953）。1938年，贝利亚成为苏联特务机构内务部的头目，在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主持大清洗运动。他的前两任亚戈达、叶若夫曾奉斯大林之命令处决了大批党政军干部。贝利亚接任后，亚戈达和叶若夫成了大清洗运动的替罪羊，前者被捕，后者被处决。许多内务部官员因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而自杀。但贝利亚比他的前任更心狠手辣，杀人无算。斯大林死后，贝利亚被捕，1953年被处决。季马舒克违心照办，但她同时写了一封信陈述诊断的分歧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致命后果，让日丹诺夫的卫士长向上转达。8月31日，日丹诺夫病逝，病理解剖证实死于心脏病。写信之事被叶戈罗夫知道，季马舒克遭到迫害，她再次向上申诉，却如石沉大海。到了1953年1月，事情突然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苏联政府逮捕了15名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大多数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医学权威，其中一位犹太裔医生玛丽·魏茨曼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统H. 魏茨曼的妹妹），被捕的还有他们的一些家人，共37人。罪名是“用有害的治疗手段谋杀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还指控这些医生曾企图“医疗谋杀”斯大林。保安机关用严

刑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是隐藏在克里姆林宫内的“美国-犹太人间谍网”（被捕者中有一个医生死于严刑逼供）。荒唐的是，在这件事上，季马舒克莫名其妙地成了“检举”的功臣，马林科夫代表苏联政府授予她列宁勋章（三个月后勋章又被收回）。斯大林死后一个月，即4月4日，贝利亚迅速为“医生间谍案”平反，以摆脱“严重失职”的责任，也试图通过平反一些冤案消除自己在苏联人民中的恶劣形象，争取与赫鲁晓夫等人较量进而夺权的筹码（其时，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这两个特务机构已经合并，仍使用内务部的名称，贝利亚任部长）。于是，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捷夫和副部长柳明成了替罪羊：伊格纳捷夫被解除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柳明被枪毙。无奈斯大林一死，贝利亚气数已尽，单枪匹马，怎能斗得过“赫鲁晓夫联盟”！1953年12月，作恶多端的贝利亚也被枪毙。